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22期

【思想文化】

毛著中的糟粕

——《重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节选）/王若水
工农化与“化工农”

——毛时代的制度与文化（下）/方惜辰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别/李慎之

【百年国史】

“动乱”中的智慧

——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五十周年/逸之
画说我的一生（25）/刘海鸥

——否定之否定（1977-1981）

【评论】

季羨林谬矣，聂元梓岂能“为所欲为”/梁幼志

——兼谈聂元梓与校文革的执政能力

【序跋】

黑与红

——断层年代的白描叙事 跋与后记/甄皓

【述往】

六年芝麻官（三）

——一个县委书记的实践与感悟/李辅

甘肃乡村见闻

——白色的国旗与希望工程/向真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毛著中的糟粕

——《重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节选）

王若水

一、中共成为统治者之后，仍把自己当成人民。与人民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因为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党具有管一切的正当性。

二、毛假定党中央和党领袖永远正确。判断敌我也好，判断是非也好，都是党的事情。这就是党的领导。

三、毛说的“民主”，其实不是民主，而是“人民讲话，党作主”。这种毛式的“民主”，开明的封建皇帝也可以实行，因为他们也常常要倾听大臣的意见再做出决定。毛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毛反复说，民主的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说服教育”。问题是：谁说服谁？谁教育谁？谁来做批评？谁来做自我批评？主体又是党，是党组织、党中央、党的领袖。

四、把处理党内问题的方法搬到党外，这是毛泽东两类矛盾学说中的一个基本错误。“反右派”斗争完全是一次破坏宪法的运动；如果不破坏宪法，毛泽东是不能够发动这场运动的。这是建国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它的理论依据完全可以在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面简称《正处》）中找到。一直到文革时期，《正处》仍被列为基本的学习文件。

五、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其中概括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要点，第一点就是划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二点又引《正处》的话说，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可见，林彪说《正处》为文革奠定了理论基础的话并没有错。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1. 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

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2.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4.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5.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

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文革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从五六年的《正处》到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用了十年工夫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

【思想文化】

工农化与“化工农”

——毛泽东时代的制度与文化刍议（下）

方惜辰

四、“两化”的特征

改造知识分子与改造工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宗旨就是一个改造人。作为制度/政策和思想/文化的“两化”虽然为毛泽东时代所特有，但是，“两化”的“初心”“使命”仍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中的应有之义。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起飞，非但不妨碍，反而强化了后毛时代坚守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理念的雄心。站在后毛时代，回看那时候的“两化”，其特征就更为鲜明。

第一，“两化”是专制主义和空想主义的结合。“两化”是毛时代官僚政治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具体实施。“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

钱理群认为专制主义与理想主义(共产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¹至少对“两化”来说，这里的理想主义换成空想主义更妥当。理想主义必须具备两个前提，要么有前人经验，要么有科学依据。共产主义既没有经验可遵循，更没

¹ 钱理群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是“理想主义与专制主义互为表里”（钱理群，下，241）。“两化”也是这样。

有科学依据。事实上，被知识分子视为理想的共产主义，在工农，尤其是农民那里，基本上是一个长达三十年的噩梦。即使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狂热年代，农民理解的共产主义的也只是小农式的绝对平均主义。后毛时代的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则在证明了当年的所谓理想主义，不过是一场百年空想。

“两化”要改造人，改造人首先要改造其生存资源。专制主义垄断了一切资源，前面说的城乡二元，单位制度等等，就是掌握生存权的具体办法。党垄断了组织（权力）资源，公有制垄断了经济资源，身份等级垄断了文化资源，单位制垄断了国人及其家属的衣食住行和前途出路。“给饭吃”“给出路”并不仅仅针对知识分子的，工农大众享受着同样的待遇。

专制主义永远是实用主义者。不过，这里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不同，它讲究的是“革命功利主义”。即毛泽东所说的：“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眼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以占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毛选三卷，821）也就是说，毛时代的实用主义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至善，它不但代表了绝大多数国人的利益，而且能够像先知一样，预见到国人将来的长远利益。有了这一条的保护，对农民的管卡压和长达三十年的超级盘剥就成了出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的善举。大跃进、三年人祸、大小四清、五七干校，也都成了“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的“好的东西。”（毛选三卷，821）。

既然只讲实用功利，就不能不投机权变。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成为毛时代的基本规则。言而无信、翻云覆雨，反复无常随之而来。1956年1月，毛提出“向科学进军”，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²会议结束时，毛发表讲话：“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薄，上，525）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毛又说：“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工作科学家。”（石仲泉，134）仅仅一年，毛、

²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报告。“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162页）

周的讲话言犹在耳，知识分子就成了必须批判改造的资产阶级。1962年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出台了《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高教六十条》。当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时说：“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薄，下，1031）。五个月之后（1962年8月9日），毛又把帽子给知识分子戴上了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薄，下，1041）

194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明确规定：“地主连续劳动五年，富农不剥削连续满三年者即可改变成分。”³1956年6月，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文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又规定：“原来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宫和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经批准可以入社做社员，取得社员称号。”⁴可直至毛时代的终结，中共也没有兑现上述承诺。

1980年中共给“四类分子”摘帽，解除其子孙的社会身份世袭制。中共的态度是，过去对“四类分子”的监督和改造“是完全必要的”，现在给他们摘帽也“是完全正确的。”（萧冬连，129）这两个“完全”的意思，就是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有理的。

一党专制必然导致个人独裁。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进入“两化”的高峰期。工农化从国家层面变成了个人的实验品，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成了工农化的主导力量。教育成为实验室中的首要标本：学校停课，教学中断；“四大”、造反成为主课；农村成为课堂，贫下中农代替了教师，“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五七干校”全面铺开；体力劳动取代了专业学习，知识分子让位于大老粗，思想改造升级为劳动惩罚。与此同时，政治身份的优越性和含金量也达到最高值。大量工农被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⁵中国社会的词汇、服装、饮

³ 194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由新华社答复划阶级成份诸问题的通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8册，394页。

⁴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1册，390页。

⁵ 当过工农兵的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位至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农业学大寨”的标志性人物陈永贵，跃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贫农的女儿、挡车女工、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吴桂贤（1964—1968西北大学毕业），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纺织女工郝建秀（1958—1962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厂任技术员）任青岛市革委会副书记，省革委会常委，山东省总工会副主任。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当上了山西省革委会常委，并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第九、十届党中央委员等。

食、娱乐、婚配，以至历史观、审美观、名利观、知识观、劳动观、英雄观等，都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

曾经接受“两化”的人们是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成长起来的。而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当初的理想却变成了“三线建设”“两弹一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就是说，“两化”所宣传的理想主义，被转化成了民族的自尊自强。文革之后，邓小平承认，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不清楚。至少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国不过处在初级阶段而已。连初级的都不清楚，遑论高级？进言之，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念兹在兹的共产主义理想，殚精竭虑的改造新人工程，不过是一场白日梦。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把国家机器分成“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⁶毛时代让这两种机器分别担负起“两化”的专制和空想的任务。“暴力机器”负责镇压——反右派、反右倾、制造各种冤假错案，“意识形态机器”负责造势——制造出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推出一部又一部红色小说和工农片，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改造和教育革命，力图将国人询唤(recruit)成非自主性的主体，改造成执政党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人”。于是，银幕上有了主动下嫁农村的知青银玲（《朝阳沟》），现实中有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董加耕、邢燕子、侯隽。诗歌中，“第三世界大战中的勇士们”为共产主义，洒血白宫。现实中，知青偷渡国境，参加缅共，战死在丛林之中。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们则献上了他们重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想之歌》。

如果把阿尔都塞的上述理论简化成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专制主义与乌托邦空想的关系——枪杆子为乌托邦攻城略地，笔杆子为专制主义提供合法性和浪漫激情。

第二，“两化”是理论迷障和现实矛盾的结合。毛时代在理论上把工人奉为“领导阶级”，在制度上却将其区隔在干部阶层之外。干部与工人虽然都有体制身份所带来的城市户口，但是在干部和工人之间横亘着一个编制鸿沟。干部编制具有工人所没有权力和待遇，对于“只有责任和工资差别”的工人阶层来说，干部不但是坐办公室的白领，而且享有其他经济上的好处。这种编制所具有的经济优势超过了政治身份带给工人的优越感。戴着工人阶级的光环，却梦寐以求地

⁶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下编“政治的哲学”，“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要挤入被改造的干部/知识分子阶层，无疑是对“领导阶级”的一大讽刺。

毛泽东发动文革，要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统治文艺的局面，要“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没想到的是，他为工农兵后代设计的成才之路，却与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相抵牾。按照“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这些工农兵的后代，一旦有了知识，成名成家，岂不又沦为反动之列？上海的某些工宣队员早就悟出了这其中的诡异。他们拒绝被结合进派驻单位的领导班子，“怕人事关系会因此被转入派驻单位，‘以后要改变成份，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自己要变成被揪斗对象，被红卫兵斗起来吃不消。’”（李逊，下，1186）

更大的讽刺在农民阶层。作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然而，一国两制、城乡二元、人民公社制度在经济上却将其打入“九地之下”。文革中，有一次高华游逛到南京大学北园的一排简易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高华，2）

贫下中农在政治身份上的优势，没有换来城里人所享有的待遇，他们的子女虽然可以通过参军、上学改变身份，进入体制，但是机会少之又少。且这种机会控制在大队、公社的干部手里。“同盟军”成了贫困落后的代名词，“主力军”只有受苦受穷的份儿。贫下中农的政治优越性只有在讨饭时才能体现出现。改变这种世袭地位，进城当工人，成为亿万农民最大的光荣与梦想。⁷

“1949—1978年的中国，公民的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虽然紧密相连，但并非始终合一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混乱和矛盾性。例如，农民虽然在政治地位上高于知识分子，但是在经济地位上却远远低于那些‘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杨晓民，345）把工农拔高到教育者的位置上，让他们永远占领学校，让这些渴望当干部的工人教育干部，让做梦也想成为城里人的贫下中农去教育城里人，而这种教育者却并不能因为地位的提高，而转成干部或获得城市户口。在大

⁷ “1949—1978年的中国，公民的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虽然紧密相连，但并非始终合一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混乱和矛盾性。”（杨晓民，单位制度，345）

学老五届身上，常会发生这样令其哭笑不得的故事：文革前，没有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不得不进厂当工人，文革中却成了工宣队的一员，被派到大学里去，教育改造上了大学的中学同窗。理论与实际的悬隔，制度与心愿的悖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角色错乱，在在昭示着时代的悖谬。

时代的悖谬导致了宣教和生活之间的一系列矛盾。一方面大力宣传劳动光荣，美化社会主义新农村，颂扬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劳动又成了普遍的惩罚手段。干部要与农民“三同”，体力劳动成了那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专利。文革中，很多著名学者、教授、走资派、“三名三高”“摘帽右派”“漏网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都有打扫厕所、清理垃圾的经历，农村成了“下放干部”“下放锻炼”“五七干校”的大本营。甚至“到文革后期，某些地方连工人阶级也要下放劳动去‘向贫下中农学习’”（李泽厚，194，注1）。农民的高尚与农民的贫贱，劳动的光荣与劳动的耻辱这两类节目同时上演，给被改造者带来莫名的困惑。

1958年春，清华大学水利系八字班的学生在密云实习的时候，“一位女同学意外地接到了与她同劳动的一位农民青年用歪七扭八的字写的‘情书’，吓得她赶紧交给了领导。过了两天，这个支队召开全体民工大会，通知我们去旁听。大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县委书记训话，训话的主要内容就是用各种污秽语言大骂那位‘一见钟情’的农民‘罗密欧’，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们听得面面相觑：我们应向之学习的对象变成了‘癞蛤蟆’，而我们这些改造对象变成了‘天鹅肉’。”（徐葆耕，195）

毛泽东的治国理政思想，尤其是“继续革命”理论是荒谬的集大成者。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却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⁸用共产主义教育人，却原来是“五斗米道”式的小农空想；反对封建主义，却使皇权专制做大做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本来少得可怜，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搞了十年，却“打了十年糊涂仗”，把宋江当成了

⁸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选集》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选集》116页）何方有问：邓小平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既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弄清楚，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怎么可能说他是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都必须坚持？”（何方，下，751页）

修正主义的鼻祖，而其所反所防的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原则”。（金春明，38）说的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一干起来却全不是那么回事。⁹本来是共产党一手建立的政权，却说有三分之一不在自己手里。“八亿人口，不斗行吗？”¹⁰奇怪的是，这些荒谬理念竟然被奉若指南，在中国盛行了近三十年。

悖谬的理念给现实生活带来种种矛盾。李逊在分析“政治名分”的时候，谈到了劳动的惩罚功能：“工人和农民的实际地位，还可以从对人的处罚看出。文革前和文革中，对人的最重处罚，除了关监狱或送去劳动教养，便是革去城市户口，发配农村当农民。即使不下放农村，下去劳动也是严重处罚。所谓‘下去劳动’，实际就是下去当工人，干工人的活。由此可见工人的崇高地位严重名不副实；农民实际地位最低，完全是个空名分。这反映出体制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反映出意识形态与体制结构的巨大矛盾。”（李逊，上，12）。

更大更突出的矛盾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上。为了改变毛时代从工农中提拔干部的旧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文件形式发布了宋任穷的《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1980年6月26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些同志总觉得当了干部就比工人、农民高出一头，这也是一种陈腐的封建等级观念，是不正确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别。在我们的制度下，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而干部则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决不能把干部视为高人一等的特殊人物。”¹¹

无独有偶，六年后，中宣部主持编写的“职工教育读本”用同样的道理来教育工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同一架或若干架巨大机器，每一个工作岗位如同机器的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社会主义是有严密分工，需要密切协作的社会结构，哪一行也少不了，哪一件工作也要有人去做，都是整个伟大社会主义

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1791页）何方对此有如下评论：“从建国后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文化大革命，以及这中间不断的各种运动，又有哪些和在多大程度上是实事求是的呢？由此可见，把实事求是列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点，这本身就不够实事求是。”“毛主席提出实事求是之日，也正是在内部大规模实践不实事求是之时。”群众路线“这在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完全变成了讥刺。而且追溯到以前，不但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刮共产风绝对不是走群众路线，就是反右派、反胡风，以至三大改造，都谈不上走群众路线。”（何方，下，379—380）关于独立自主，何方认为，《历史决议》“关于内政错误外交正确的说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际上都是站不住的。”毛时代“不仅同苏联破裂，而且近乎全面出击，同帝修反斗，支援世界革命。结果造成外交上的严重失误和孤立。”（何方，下，380—381）

¹⁰ 这是毛泽东1975年12月31日晚11时50分至次日凌晨45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时说的话。《毛泽东年谱》第六卷，6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¹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事业的一部分。有人从封建的等级观念出发，把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分工，看作三六九等、高低贵贱之分；有人从个人得失出发，依照工资高低、技术繁简、劳动轻重来划分岗位的好坏。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岗位，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都是崇高的、光荣的；作为祖国和人民的需要，都是可敬的、可爱的。”（中国工人阶级，141）

这种苍白说教，在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联手，民权日微，官权独大、贫富悬殊，工农阶层丧失了政治优势，跌落到十大阶层的第八、九位的现实面前，以其出离的保守僵化，彰显着后毛时代的理论贫困。

20世纪80年代之初，在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之后，体制内外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浪潮。这一被称为“庚申变法”的改革，就包括摆脱上述悖谬和矛盾的思路和努力。以徐文立为代表的民间的改革者发表《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以“四权分立”（共产党享有指导权，人大和政协享有立法权，国家机构享有行政权，法院享有完全独立的司法权）和“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组党自由）为诉求。（钱理群，下，199—200）

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则向社会民主党靠拢，重新考量国体、政体和工农阶层在宪法中的定位。1980年10月，中共政治局的智囊人物廖盖隆在一个长篇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改革思路：第一，修改宪法，把人代会分为两个院，一个区域院，代表地方，一个社会院，代表社会各阶层、各企业，两院共同行使创造和立法权力，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第二，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取消党委审查案件的权力，法院独立办案，不受党委干涉；第三，建立独立农会，以维护农民利益；第四，允许各舆论机关，新闻记者独立地报道新闻，发表评论；第五，基层企业事业机关实行直接民主，逐步直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第六，取消政治局，成立三个权力平衡的中央机关，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¹² 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放弃毛时代的意识形态，重新确立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悖谬和矛盾，是官民改革思路的共同点。

第三，群众运动与道德教化。群众运动是毛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早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毛主席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

¹² 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第3期，转引自钱理群：《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下册，200-201页。

路线’。这里所说的‘群众工作传统’‘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群众运动。”（薄一波，下，747）

上述制度的优越性是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这是推进“两化”的社会基础。除了打击想象中的政治对手之外，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基本目的就是改造人的思想。¹³改造思想首先是从道德教化入手。

从五十年代的“忠诚老实”运动、“洗澡”运动到文革中的“接受再教育”“五七干校”，毛时代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难以计算。如果说，群众运动是促进知识分子的工农化的形式，那么，道德主义则是这些运动的主要内容。道德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民粹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章太炎、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傅斯年、顾颉刚、陶行知……，从民初到五四，从共产党的创始人到学者、名流、教育家，都宣传尊劳主义，歌颂劳工神圣，鼓吹到民间去，到乡村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让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的对比中，感到自身的道德缺陷，在与劳动者的相处中净化自己的灵魂。民粹主义所颂扬的体力劳动，更是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得心应手的武器。科拉科夫斯基对此做过如下的酷评：“马克思主义传统把劳动当作必要的邪恶，认为通过技术进步，人类将逐步从中解脱出来；但对毛来说，体力劳动本身是高尚的、有不可取代的教育价值。”（科拉科夫斯基，3卷，491）

儒家的修身观念、大同理想和传统文化中的民粹主义，与知识阶层的道德追求和“圣化构想”相契合。毛泽东抓住知识阶层的这一特点，借助制度的威力和延安的经验，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使工农化畅通无阻。1950年，文华影业公司拍了一部描写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学员们进行思想改造的影片《思想问题》，片中最重大的思想分歧就是对劳动的看法。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周正华反对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校党委的女主任陈绮开导他：“我问你，原始社会没有大科学家，也没有哲学家，更没有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世界是谁创造的呢？从茹毛饮血发展到畜牧种地，又是谁创造的呢？推而广之，整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今天我们所以要特别重视以工农为主的劳动人民，也是因为他们才是创造者，人类历史的主人。科学家不过是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罢

¹³ “决策者认为，思想改造运动可以极大地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并且创造某种奇迹。最典型的例子是针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导致了大跃进，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导致了反右派运动，对官僚机构的思想改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杨晓民，346）

了。”听了这番话，周正华博士放弃了原来的观点，由落后而进步。

如李泽厚所说：“这种高扬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改造运动，确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自觉的革命意识，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念和斗志，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革命实践活动。重视思想意识和个人修养便从此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色。”（李泽厚，179）

提高道德意识，加强个人修养的目的是提升人生的价值，实现个体的理想。毛时代将服从革命需要作为衡量进步与落后的标准，用集体主义取替个人意志，将人生价值和个人理想统摄到了革命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之中。共产主义理想替换了马斯洛所说的人的最高需要自我实现，为这个理想献身，成为那个时代志士仁人最崇高的目的。

针对工人的群众运动，其荦荦大者，如50年代初的“增产节约”，1958—1960年的“大炼钢铁”，60年代初的“比学赶帮超”“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以及后来的“工业学大庆”。这些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前一个没完，后一个就来了。而且有些运动，成了常设项目，如“增产节约”运动，且说法不断变化。¹⁴类似的还有“五反”运动。

还有一些运动，如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虽然被改造的是私企商人，但是从事改造的是工人——由工人揭发检举不法商人，由工会出面宣讲政策，最后由工会党组织裁决。¹⁵严格地讲，这些运动也是一种对工人的改造——在赋予工人“强助权力”的同时，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当家做主”的意识。

改造工人的目的，就现实层面而言，是激发工人的干劲，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就思想层面而言，是用共产主义道德和理想对工人进行教化，使之成为“新人”的表率。

¹⁴ 1951年是为了抗美援朝，1952年是为了“改善经营管理”（1952年7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册，541页）。1955年是为了“反对浪费”（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同上，21册，1—2页）。1957年又说增产节约“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195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同上，22册，1—7页）。1960年改成了“保农保钢”（196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同上，23册，354—358页）。1962年则是为了“减少财政开支，保证市场供应”（1962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同上，24册，35—36页）。

¹⁵ 1957年江南电影厂出品的《不夜城》中对工人在“五反”中的作用有充分的描写：工人们揭发大光明纺织厂的老板张伯韩有“五毒”行为。工人代表沈银娣找到张伯韩的女儿张文铮，动员她与父亲划清界限。张伯韩为了过关，虚报偷漏税的数额，沈银娣代表组织，宣布张是“基本守法户”，并退还他多交的钱款。

在各种媒体对工人阶级的宣传中，毛时代的电影做得最好。¹⁶五十年代的工业片，如《伟大的起点》《无穷的潜力》《英雄司机》，六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第一春》《春暖花开》《青年鲁班》等，大都沿袭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桥》的范式，将民族自尊心和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在歌颂工人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和冲天干劲的同时，批判技术工作者的保守落后。文革又将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加入这一范式之中，《创业》《钢铁巨人》《火红的年代》等影片将工人形象进一步提纯和神化，直至打造成“高大全”。（启之，上，16章，下，12章）

毛时代是英模辈出的时代，“建国以来荣获各级劳动模范称号的工人有七百多人，约占工人总数的千分之五左右。”¹⁷著名的有青岛棉纺厂女工郝建秀、沈阳女营业员李素文、鞍钢工人孟泰、王崇伦、李绍奎、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上海纺织女工黄宝妹、广州制药厂女工向秀丽、咸阳挡车女工吴桂贤、大庆铁人王进喜……

同是以劳模来创造新人，中国与苏联不同。“斯大林强调劳动模范应该拥有新技术和新文化，工人的文化和技术水准能提高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程度，只有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异消失了时，才能到达共产主义阶段。斯塔汉诺夫是苏联领导心目中的‘新苏联人’的理想典型。”（余敏玲，265）比如在宣传劳动模范上，苏联的重点是新技术。“在提高劳模的文化程度上，斯大林期望工农出身的劳动模范不只是识字而已，还要能够有向上提升的文化素养，拥有资产阶级生活品位（如电影《光明之路》的女工用香水，穿洋装）和文化品位（出席音乐会，欣赏芭蕾、阅读俄国的经典文学）。毛泽东时期的劳模主要在于提高他们的识字程度，但排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毛泽东更重视劳模政治意识的提高。”（余敏玲，345）

尽管有以上的区别，中苏在基本理念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虽然是当代最先进的阶级，但它是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只有经过教育和灌输，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工人阶级才能提高阶级觉悟，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因此，有必要“重新向工人阶级灌输共产主义思想”。¹⁸即使面对

¹⁶ 在1982年冶金部、全国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和鞍钢组成的调查组提交的《关于鞍钢部分职工状况的调查报告》中谈道：“工人阶级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淡薄了。许多老工人和中年工人反映，现在报纸很少宣传工人阶级，银幕上很少颂扬工人阶级。”（《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册，16页）。

¹⁷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关于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54页。

¹⁸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关于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2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着现实的巨大挑战，后毛时代仍旧坚守着这一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并且坚持用道德教化来改造中国人的路线。

因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所以毛时代针对农民的群众运动要比工人多得多。¹⁹土改、统购统销、互助组、合作化、共产风、人民公社、反“五风”、反“三自一包”“四清”、学大寨，以及文革中一波又一波的“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这些运动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是对农民进行道德教化的代表作。这一运动的起因是1956年各地掀起的退社潮，而农村干部又对高级社持怀疑态度。为了推行集体化，当时的中共中央只能求助于改造思想。“对所有农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由此发动。

“社教”从195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65年，到了文革期间又出现了反复。²⁰因为时间拉得很长，其目的和说法也不得不与时俱进。1957年是要求农民接受合作化，说这场运动“是农民群众和乡村干部的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²¹1958年又发指示，要求对“政治觉悟愈来愈高”的五亿农民“进行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运动”。简言之，就是强迫农民说人民公社好。²²六十年代初，重提阶级斗争，制订了“双十条”，“社教”又成了改造“新人的伟大的运动”。²³

改造“新人”要落到实处，“社教”转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针对的是支书、队长、会计、保管等农村的基层干部和他们的上级领导。地富反坏则被视为他们的“后台老板”。²⁴各地纷纷建立起“贫下中农协会”，监

¹⁹ 1956年闹退社，干部也怀疑高级社的优越性，“后来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来平息农民的不满。”（薄一波，上，370）。

²⁰ 196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2月20日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同年3月7日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同年12月4日，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些文件的主旨是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不准当时下台的干部反攻倒算。详见《四清运动实录》332-333页。

²¹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农民就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的统购统销等进行大辩论。指示说，这一辩论的“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村干部的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22册，265页。

²²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再发《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中，仅共产主义（精神、前景、行动、风格）就出现了九次。22册，510—512页。

²³ 1963年5月10日《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9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4册，203、239—252。11月14日《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件文件的通知》。通知说：“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为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动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同上，24册，341—342页）。

²⁴ 1964年12月20日，在讨论“社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

督基层干部的退赔。很多干部退赔得倾家荡产。各地又纷纷颁布了新政策，重新划分阶级，审查社员成分，没收漏划地主、富农的房产家具。“这些规定，比土地改革时还要严厉，而且对富农与地主基本上不加区分，这就使那些错划了成分的人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郭德宏、林小波，251）

“伟大的运动”得有宏大的队伍，于是“大兵团作战，整训工作队，百万干部下乡蹲点，以及不断反右倾，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起。”（郭德宏、林小波，251）。其规模之大超过了土改。²⁵高潮起处，“四清”又升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清”的结果是，发现了大量“烂掉的”单位，挖出了大量的“反革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农村没人愿意当干部，“有的说，‘当干部没好下场’。”“有的说：‘谁选我，我喊谁爹，到谁家磕头。’”（郭德宏、林小波，249）

这种改造农民的运动在毛时代结束之前，一直坚持不懈。“年年秋收一结束，就搞运动。整党、整风、整社，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许多生产队社员当队长都轮遍了，也不见好转。”“对普通群众也不放过。说农民是小私有者，有自发资本主义，长着‘资本主义尾巴’。昔阳学大寨的经验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批促大干’。把农民当牛马，‘批’就是打在农民身上的鞭子，赶着农民‘干社会主义’”。²⁶这是20世纪70年代在山西襄汾任县委书记的李辅的感悟。

在对农民的道德教化上，媒体和文艺工作者同样全力以赴。还是以电影为例。毛时代出产的农业片在数量上超过了工业片。²⁷这些影片的主题与时俱进，五十年代宣传农业合作化（《春风吹过诺敏河》《不能走那条路》《人往高处走》等）。六十年代宣传人民公社（《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等）。至文革前夕，“黑五类”破坏集体经济成了主流，《夺印》《槐树庄》《山村会计》等影片从1962年的9%，一路飙升，1963年是31%，1964年是34.6%，1965年是26.8%。及至

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1368页。

²⁵ 同第一个《后十条》相比，《后十条》修正案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认为这个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郭德宏，林小波，150）

²⁶ 李辅：《六年芝麻官——一个县委书记的实践与感悟》，2019年，自印书。

²⁷ 在革命历史/战争、工业和农业这“老三样”题材中，农业题材的比重一直高于工业题材。在1956—1957年生产的61部故事片中，革命历史/战争题材17部，占总数的27.8%；工业题材只有1部，占总数的1.6%；农业题材10部，占总数的16%；其余是城市题材。在1958—1959年生产的156部故事片中，革命历史/战争题材44部，占总数的28.2%；工业题材39部，占总数的25%；农业题材37部，占总数的23.7%；其余是城市题材。1960—1966年共生产了故事片198部，革命历史/战争题材62部，占总数的31.3%；工业题材17部，占总数的8.5%；农业题材50部，占总数的25.5%。其余的是古代/现代戏曲片。见启之：《中国电影：一个观念与制度的历史》上册，第18章第一节，第22章第一节。

文革，原来的公式概念进一步完善，发展成为“地富反坏右”与党内“走资派”携手破坏学大寨，阶级斗争也由此提升到了路线的高度。

这个高度使影片不约而同地建构起一种“阻拦模式”——《青松岭》中，老贫农张万有拦住钱广，不准他给社员带山货到集市去卖。《艳阳天》里，萧长春在村口拦住出去打工的社员。《海上明珠》中的凌燕子拦住外出打鱼的船，禁止社员“赶小海”。《沙漠里的春天》中，娜仁花揭穿了队长达木林的阴谋，拦住外出打猎和逃荒的牧民。《山花》中，高山花拦住副队长和那些会木匠手艺的社员，打破了他们“每人每天给队里交一元五角，剩下的归自己”的外出挣钱的美梦……。（启之，下，243—245）

毛时代的政经体制决定了农业经济的必然下滑，要扭转这一趋势，除了突出政治之外，别无选择。而毛泽东的政治（或者说治国理政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制造对立面（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毛将这些对立面统称为阶级斗争。贯彻落实这种政治的手段，对内部是机变权谋，对外部是群众运动。毛迷信群众运动，醉心于改造人们的思想，由此走上了用精神力量去对抗经济规律和人心人性的不归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时代教化工农的最后手段——将伟大领袖的号召变成国家的行政命令，用“精神原子弹”去战胜物质匮乏，用王进喜、陈永贵这样的“新人”榜样去激发在低工资和温饱线上挣扎的工农大众。尽管后毛时代仍旧将这类精神、榜样列入的“红色文化”之中，但是在工农业领域，学大庆、学大寨却鲜有提及，其不可复制性由此可见。

五、“两化”的性质

“两化”的“初心”是创造“新人新世界”，新时期抛去了其中的浪漫色彩，具体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层面。不管是什么样的“初心”，“两化”都违背了所有阶层的利益——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苦，思想越来越僵化偏执，精神世界越来越贫乏逼仄，幸福感越来越少，直至被浩劫所代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奋斗了三十年，中华民族仍旧积贫积弱，所谓复兴遥遥无期。

但是，“新人新世界”在另一种意义上实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成了“两头真”，知青中的先进分子成为反专制，保人权，争自由，要民主的先驱。

近年来，大陆学界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名，以批判“非马克思主义的

错误思潮”为学术导向，抹杀毛时代与后毛时代的制度差异，脱离“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政治背景，割裂历史，混淆当年的“三同”“下放”“上山下乡”与当下“大学生当村官”“三支一扶”“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不同性质，配合时下政策，为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叫好²⁸，使一代青年重新陷入毛时代的思想迷局之中。

谈论工农化后果的文字很多，想到并论及“化工农”的著述很少。而探讨“两化”后果的文字更为罕见。如果我们把“两化”放在一起分析讨论，其后果会呈现得更清晰。

1. 反文明、反现代化

社会分工创造了人类文明。马克思说过：“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²⁹有了这一分离，才有了大工业，才有了现代化。在现代化向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社会分工提出更高的要求的时候，“两化”则要消除社会分工，推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化的人民公社，创建学工学农学军的大学校，将几十万干部和知识分子放逐到“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脑力与体力的基本分工被摧毁。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城市化、知识化的发展水平。“两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名，将城市农村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科拉科夫斯基告诉我们，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实践第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但由此推理说读书有害，文盲自然比有文化的人更聪明却实在不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辩解。用农民取代无产阶级的最革命阶级的地位公然违背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把体力劳动尊为人类最崇高的职业则是对马克思乌托邦的可笑解释。把农民阶级当作没有被分工损害的‘全面的人’的最高尚代表，这个观点在俄国19世纪的民粹主义那里也有过，最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普遍的平等原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很难设想马克思会认为这条原则应该表现在打发知识分子下稻田的政策中。举个不对应于年代的比喻，根据马克思学说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毛主义当作原始共产主义一类的理论，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

²⁸ 如葛元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再认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8期。李强、单超：《历久弥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及其当代继承与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8期。

²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产主义不但还没有克服私有制，甚至尚未达到私有制阶段。”（科拉科夫斯基，3卷，494）

裴毅然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位五旬工人之语：“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对待工人农民的态度，考验—个民族的道德良心。”作者认为，“此语相当意义上触及中国思想界—直十分敏感的纠结点——到底如何摆放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如何对待知识分子，体现了—个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程度。反右、文革证明：—个以无知为尚的社会，当然不可能走上知识化科技化。缩小三大差别，不应通过压低知识分子去迎合工农，只能提高工农文化，实现全社会的知识提升。”³⁰

—个文明的国家，—个现代的社会，其人民整体上的必然是爱清洁、讲卫生，有礼貌，有教养的。工农化在拔高工农的同时，将农村文化带进了城市；“化工农”在贬损知识分子的同时，将城市文化踏到脚下。与工农相结合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学会了说脏话、爆粗口、讲黄段子，不讲卫生、身上长了虱子成了思想革命化的标志。“两化”污染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卫生观，使中国的文明程度大大倒退。

2. 反智、反社会

“两化”有两个互相支持的方面，—方面是极端尊崇体力劳动，另—方面是极端轻视文化知识。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毛时代仅是纸上文章，实际发展的是德（政治觉悟/表现）和体（劳动）。所谓“又红又专”，看重的是“红”，打压的是“专”。对“白专”的批判，把求知好学和钻研业务统统归入“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结果是只红不专。这种反智主义是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重要原因。

农村的经济、文化落后，旧思想旧文化在那里有着深厚的土壤。“两化”将农民的皇权主义和清官思想转换成对党和领袖的愚忠，现代迷信和专制主义大行其道。本来应该是知识分子启迪民智，改造农民，“两化”却反其道而行之，推行蒙昧主义。把农民变成教师，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变成学生。“拜工农为师”“与工农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但堵塞了民族的启蒙之路，而且强化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愚忠意识，极大地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³¹

³⁰ 裴毅然：《当代中国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矛盾的由来与后果》，2010年5月30日网文（2016年10月3日查阅）。

³¹ 杨晓民的谈论单位制度的时候指出：“大量缺乏必要文化素养和从政经验的职业革命者仓促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从而形成了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的政治特色。这种政治特色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初始建设条件，

何方指出：“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向贫下中农学习，不但违背马克思对农民的评价和列宁的灌输论，而且也与客观事实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因此，提出知识分子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号召，以及按这个精神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啦，迁移大批城市居民下乡务农啦等等，实质上都是倒退的，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不但对这个群体和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而且直接影响和妨碍社会进步。”（何方，下，430）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各阶层的和谐相处，任何社会都会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和平共处、彼此包容、互相尊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标志。“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在农村内部铸就了一个经济上平均、政治上以身份为阶级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而在城乡之间建起了一道歧视农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鸿沟，阻滞了中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陆学艺，168）

社会安定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保证个体安全感的前提。毛时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破坏了社会安定，“折腾”了经济，折磨了人民，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安全感。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矛盾，消解矛盾，整合社群是统治阶层的首要职责。毛时代反其道而行之，以革命的名义，人为地制造并激化矛盾。“两化”将知识阶层置于工农的对立面，视为应该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在城乡的二元对立之外，增加了脑体的二元对立。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和平与稳定被破坏殆尽，人群被支离，社会被撕裂。

3. 反人性，反常识

“两化”乖情悖理，违反常识；它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将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它用体力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将他们变成党的“驯服工具”。它用“强助权力”拔高工人，将其改造成大公无私的“领导阶级”。它用人民公社压迫农民，将农民改造成泯灭了“自发势力”的二等公民。它让国人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名誉、地位、财富，古今中外人心所向。名誉、地位是自我完善的社会标准，

他们对权威人物的崇拜和传统关系网络的摹仿，使得社会主义精神被强烈地粗鄙化了。这种粗鄙化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精神理解的粗鄙化。”“文化上的粗鄙主义和技术上的投机主义构成了单位社会前三十年的一个重要特征。”（杨晓民，347）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正当手段获取财富是个人能力高下的标志。“两化”在扫荡“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等旧思想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这些人性和人情所维系的基本价值统统打翻在地。如果你长大想当作家、医生、工程师、科学家，而不想做一个普通劳动者，那么，你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受到批判。访贫问苦、忆苦思甜、写“四史”等的活动，将“富则修”“越穷越革命”等邪说歪理植入人心，以至“比谁更穷”成了时代风尚。

哈工大学生李耿立在回忆中谈道，文革初，他们到西安串联，参加了那里的千人绝食：“当时几个学校要成立一个会务组。哈工大推选的老李一上台，就有人喝问：你什么出身？老李答道：雇农。他一口东北话，吐字不太清。底下一堆人乱喊：富农不行！滚下来，滚下来！老李又大喊：我是雇农！雇农！我们人也喊：雇农比贫农还穷！这才平息了众人的疑问。”³²

一个三代工人的后代在讲述了解放后一家人的穷苦之后，得出结论：“当然，我们家解放前也穷，穷得叮当响，可那会儿，咱工人没地位，是三孙子。而解放后，咱是国家的主人，穷得光荣、穷得心甘情愿，只要党号召，咱就穷到底。”³³

爱美是人之天性。毛时代将爱美归为资产阶级，“头缠白羊肚手巾，身穿自制的土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取代了一切。”（李泽厚，245）。抒发感情的方式有多种，自古以来，就有“大江东去”式的豪放，“晓风残月”式的婉约。五十年代的浪漫抒情，至了六十年代成了禁忌，俄罗斯民歌渐成绝响。文革则将感情的抒发固化到“战地新歌”的模式之中，精致、高雅、优美成了封资修。人的禀赋不同，兴趣爱好多种多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毛时代用“政治统帅一切”，将一切异于主流的兴趣爱好消灭殆尽。

本应该内行领导外行，毛却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³⁴“一般说来，

³² 李耿立：《杂忆黑龙江的文革狂潮——我的大学后四年》，自编者电子书，2018。

³³ 其家之穷是因为食众而收入少：“老爷子一个人工资50多块钱，养活7口人，甭管怎么算它也不够花。”“五个上学的孩子，饭肯定是吃不饱，衣服肯定是没有穿。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饿得跟孙子似的，每天喝白薯粥吃菜团子，拌马苋菜，夜里饿得睡不着觉，光听见哥儿几个的肚子在叫。穿得更甭提，补丁落补丁，不怕大家笑话，连我姐姐的裤子都露屁股。”“那会儿哪有书包呀，一块破蓝布缝上边缀两根布带，那就从一年级一直提到六年级。”（者永平，下，464）

³⁴ “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200页。20多年后，薄一波替毛圆场：“一切事业都不能靠外行来办好。我们过去讲外行领导内行，是指政治上、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同时也是从当时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历史状况出发的。建国初期，我们党没有多少专门人才，我们只能用些土地改革的干部、解放军的干部来管经济，管企业。”薄一波《人才的培养和使用》（1980年1月15日）《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84—85页。薄一波应该知道，毛的这一观念是其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外行领导内行的思想和作法贯穿于整个毛时代，并不是限于条件的权宜之计。

知识多总比知识少要好”³⁵，却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本来应该有知识的教育无知识的，却让工农兵永远占领学校。³⁶最后发展到学生打死师长。知识分子“90%以上是解放后党培养教育出来的，70%以上出身劳动人民家庭”³⁷，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全国，把上面所说的90%的自己人和70%的“红二代”统统打入另册。“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毛时代却要求人们饿着肚子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六、结语

近代史上，大凡极权政体的创始人都具有创造新人新世界的浪漫激情：洪秀全要在太平天国中实现“十新”，³⁸ 墨索里尼要在意大利“重新塑造人”，³⁹ 列宁为星期六义务劳动叫好，呼唤“新人”的诞生，⁴⁰ 斯大林则把苏联建成了一个“新世界”——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极权国家。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们都无法与毛泽东相比。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立志要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⁴¹ 就醉心于“新村”计划。⁴² 为了这一理想，他以改造人性为毕生事业，不惜一切代价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图画新则新矣，但一点儿也不美。“两化”是颠倒且悖谬的文化，它颠倒了文明社会的规则，悖逆了人性和常识，把虚幻的想象强加到人们身上。晚年的

³⁵ 胡耀邦：《全党必须确立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念》（1983年3月13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8页。

³⁶ 陈哲人有《我在北大六十年》一书中谈道：“解放之初，革命锋芒正锐，似乎一切旧东西都是反动的，一切都要翻个底朝天，老师也是旧的，老师的知识也是旧的，老师的思想也是旧的，老师的思想需要改造，老师需要批判。从上面传来的声音：尊师重道是一种旧思想，是需要打破的。别人我不敢说，至少我是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没有尊师的观念。后来我们当了老师以后，当说到学生不尊重老师的时候，一位同事反省说：“我们尊重过老师吗？我们受的是什么教育？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18页，东方出版中心，2010）。

³⁷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1978年11月3日），《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53页。

³⁸ “十新”是洪秀全为宣传太平天国而编写的一首诗，全诗是：“上帝基督住人间，天地新；爷哥带朕幼作主，朝廷新；父子公孙同作主，天国新；爷妈哥嫂同下凡，天堂新；太平天日照万方，世界新；天将天兵齐辅佐，爵职新；在地如天圣旨行，山海新；蛇兽伏诛人安妥，臣民新；一统万年万万年；景瑞新，风调雨顺天恩广，万象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54页。

³⁹ 杜美谈到，西方学界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种类似革命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确定极权统治的目的并为此而申辩，这个目的是完全的、激进的且是永久性的革命的对国家和社会的改造，直至创造‘一种新人’，直至达到一种和平的终极状态（乌托邦式）。”墨索里尼在这方面有过明确而坚定的思想。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不只是法律的赋予者和机构组织的创立者，而且是精神生活的教育者和促进者。它不愿重新创造人们生活的各种形式，而要重新创造其内容，重新塑造人，塑造性格，塑造信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4页。见杜美：《欧洲法西斯史》，第28页及第19—2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

⁴⁰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⁴¹ 毛泽东：《与黎锦熙书》，1917年8月23日（金冲及，26页）。

⁴² 同上，第53页。

毛泽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七八年再来一次”，既说明毛“继续革命”的痴心，也说明他与风车作战的痴迷。他的政治遗言对建政后的功业只字不提，而用“血雨腥风”来告诫他的接班人，这其中透露的信息大可琢磨。

1967年李光耀对尼克松说：“毛泽东正在瓷砖上作画，下雨时他的画会被冲刷一空。但中国还会存在下去。”⁴³ 这说法需要纠正：第一，这幅画不是毛一个人画的，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创作。⁴⁴第二，这幅图画并没有随着毛的离世而被冲刷一空，它仍然出没在后毛时代，并且会在自我调整之中长久地存在下去。■

参考文献

正式出版物

阿尔都塞，2011，《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杜美，2000，《欧洲法西斯史》，上海，学林出版社。

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邓小平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高华，2010，《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郭德宏、林小波，2005，《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何方，2007，《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下），香港，明报出版社。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1996，《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逢先知、冯蕙主编，2013，《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2015，《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衣俊卿主编，侯一麟、张玲霞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李逊，2015，《革命造反年代》（上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1997。

陆学艺，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启之，2019，《中国电影：一个制度与观念的历史》（1—2），美国，华忆出版。

⁴³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转引自邵燕祥：《读书札记》，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⁴⁴ 李泽厚说：“工农化的选择并非偶然，它的提出和推行，也并非仅仅取决于毛个人的意见。”（李泽厚，175）。“化工农”的选择同样并非偶然，它的提出和推行，也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创作。

石仲泉等编，1998，《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1979，《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萧冬连，2008，《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动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徐葆耕，2011，《清华精神生态史》，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杨晓民、周翼虎，1999，《中国单位制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台湾）余敏玲，民国104年，《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

者永平主编，1998，《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下，北京，远方出版社。

《中国工人阶级》编写组，1986，《中国工人阶级》，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1981，《关于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1983，《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8—24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1986。

非正式出版物

李辅：《六年芝麻官——一个县委书记的实践与感悟》，2019。

李耿立：《杂忆黑龙江的文革狂潮——我的大学后四年》，2018。

文章

葛元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再认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内部材料，1983。

李强、单超：《历久弥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及其当代继承与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8期。

李志英：《增产节约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双面相——基于工业生产领域的考察（1949—1966）》，晋阳学刊2017年第2期。

吴思：《读史随笔：公家田里好长草》，北京青年报，2002年8月27日。

谢忠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增产节约运动研究鸟瞰》，《井冈山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3月, 第38卷第2期。

裴毅然:《当代中国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矛盾的由来与后果》, 2010年5月30日, 网文(2016年10月3日查阅)。

【思想文化】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别

我以为, 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 其中任何一种, 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 是优是劣, 只要没有消失, 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东西只要慢慢失传了, 如《周礼》中的许多规矩、制度, 也就从传统文化变成已死的“文化遗迹”了; 外来的东西, 只要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了, 与中国文化接轨而融合, 它就可以称是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 我们今天是没有会把它看成是传统文化的, 但是再过若干年, 它们就可能像我们今天看胡琴、金刚经……一样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 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 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 或者是极难变的, 如庞朴同志所说的是一种惰性力量(或日惯性力量), “任你风吹雨打, 我自岿然不动”。

因此, 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 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 (选自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百年国史】

“动乱”中的智慧

—— 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五十周年⁴⁵

逸之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距今已经五十年了。这是我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的第一

⁴⁵ 本文选自《洋流仍在呵护》一书, 作者: 曲格平、曼斯·朗诺斯、李来来,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 年出版。文章标题是编者加的。

个联合国召开的大会议。也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共有一百一十三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一千三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因它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所以也被称为斯德哥尔摩会议。时任大会筹备处秘书长的莫瑞斯·斯特朗说：“斯德哥尔摩会议作为启动国际环境外交新时代的重要里程碑已载入史册。”这话实为中肯。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十二月十二日，斯特朗秘书长通过我国驻联合国使团团团长乔冠华，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参会的邀请。当时，我国正值十年“文革”动乱，人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极左情绪。对待世界性的环境问题，我们差不多是采取事不关己、甚至抱有些幸灾乐祸的态度。那时候，我们并不相信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环境危机或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我们认为污染公害是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正是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的邀请仍引起了国家总理周恩来的重视。当时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的曲格平先生回忆说，当外交部把是否参加人类环境会议的请示送到国务院时，周总理不仅同意参加而且还做出具体的指示。整个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周恩来总理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但对环境问题仍甚为关切。

曲先生说，最初外交部建议让卫生部组团参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对环保问题认识的粗浅，认为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不过是个卫生问题。周总理看了出行名单后说，这不行，环境问题不仅是卫生问题，它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而且，代表团回来还要制定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卫生部做不了这些事，还得要综合管理部门来组团。周总理要李先念和余秋里两位副总理来办这件事。当时的综合部门是指国家计委。余秋里同志点名让燃化部副部长唐克率代表团去出席。名单再次报到总理那儿，总理仍认为，领导力量还需要加强。他说，代表团要有工业、农业、水利、外交方面的人，还要有综合部门的人，再配一名副团长，从国家计委负责人中出一位。事实上，当时的国家计委已被冲垮，但对外还是用“国家计委”的名称，实际工作是由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担当。最终，我国派出了以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为首的代表团参会。曲格平先生正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中负责环保工作，成为代表团一成员，见证了人类首次环境会议的盛况。

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曾经召开过一个讨论会，大家一起商议会上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代表团成员应该如何应对，以及对代表团团长的主旨发言稿提出意见。曲先生回忆说，讨论会上有多人发言但绝口不提环境问题，主要的焦点都是如何去进行国际阶级斗争。当时，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官员也来参加了讨论。在大家讨论得兴致正浓的时候，他忍不住插话道，“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参会的一百多个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都来了，都是资本主义，有好有坏，要区别对待。我们这样把批驳资本主义制度罪行作为发言的主旨，是不是就意味着把会场里大部分国家都骂了一个遍呢，请再考虑一下分寸。”

周总理看到发言稿后给出了意见说，对自己的成绩不要估计过高，也要承认我们现在也存在污染环境问题，要注意学习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总理明确提出要看到自己的问题，要注意向国外学习，表明了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能不说，我国的这个代表团组建的十分匆忙。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要在这样一个国际性的会议上做什么，跟人家谈什么，表达怎样的立场。曲格平先生还清楚地记得代表团在出发前，外交部和燃化部给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出席人类环境会议方案的请示》，里面分析说，“环境会议虽然表面上是专业会议，有在环境问题上交流经验、寻求国际合作的一面，但实际上必然反映当前国际上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斗争将是比较复杂的。”说白了，那时我们也不懂什么是环境保护，在国内如火如荼地搞阶级斗争，到了一个国际性的环保专业会议上也不能忘“国际阶级斗争”。只有周恩来总理是清醒的，他在这份请示上批示说：“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但这些话在当时的作用十分有限。

1972年5月30日，由四十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斯德哥尔摩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在各方的努力下“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6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开幕了。上午十一时，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富丽堂皇的皇家歌剧院里，瑞典政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瑞典国王和首相在那座有百年历史的殿堂里，欢迎前来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一百多个国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和联合国的

相关官员。从那天起之后的十多天里，斯德哥尔摩这个北欧最古老、静谧的城市见证了人类环境觉醒的进程。

大会要完成五大议程。一、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 简称《宣言》); 二、通过《人类环境行动计划》(Action Plan for the Human Environment, 简称《行动计划》); 三、设立专门负责环境问题的机构即联合国环境署(UNEP)和对其的资金安排; 四、通过一些相关事宜, 如设定六月五日为世界环境日等; 五、针对各国的情况, 向各国政府推荐行动方案。《宣言》和《行动计划》是大会的两个核心文件。特别是《宣言》, 那次会议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全球环境保护的行动纲领。而这份文件却成了我们中国代表团进行政治斗争的主要对象。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一个讨论环境问题的专业会。我们的代表团一方面在会上表现得无所适从, 对多数文件的审议听不懂, 也不知道该如何发言。另一方面, 我们又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得很自信、咄咄逼人, 用了大量的精力来批判美帝国主义在全球犯下的侵略行径, 把一个环境会议当成了政治斗争的战场。后来, 代表团收到一个国内发来的电报。电报指示代表团对美国的揭露和批判不能无休止的继续下去。这是很简短却很重要的批评, 中国代表团没有对全团传达这个电报, 但立即停止了对美国的批判。

会议召开一周后,《纽约时报》刊载的一条消息。“尼克松总统整个周六下午一直从白宫通电话同美国代表团团长特雷恩保持联系, 他对中国人的批评非常生气。”⁴⁶ 在曲格平先生保留的关于参加人类环境会议的资料中, 有不少当时世界主流媒体对那次会议的报道, 其中不乏一些关于中国代表团的报道。媒体的报道可以反映出会议期间国际社会对中国代表团各个方面的评价。《纽约时报》的报道可能会让今天的读者联想到, 究竟中国代表团在这个以环境为主题的会议上做了什么, 竟会让尼克松如此生气?

其实, 一开始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团和媒体对中国都持一种友好的态度, 同时也充满了好奇, 毕竟中国刚刚重返联合国。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对国内的三废利用情况进行了宣传, 让人们觉得, 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废弃物循环利用做得最好的国家。瑞典的一家报纸甚至说“中国是人类环境保护的世界大师”。但很快, 中

⁴⁶ 摘自 1972 年 6 月 12 日《纽约时报》。

国代表团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要对《宣言》进行修改，以及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进行揭露和批判。这种强硬态度和举动让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会场上的这位新伙伴。

十多天的会议对中国代表团来说也极不寻常。代表团的成员除了在会场里听不懂环境业务的发言，会外就是回到中国驻瑞典使馆里开会。很多时候会开得太晚，回不了宾馆，大家就在使馆的地毯上凑合眯瞪一会儿。在使馆开的那些碰头会上，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讨论如何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如何修改《宣言》。

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召开之前，联合国的会议工作组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起草了《宣言》的文稿，期间也以不同形式和各国有过交流。另外，专门讨论环境与发展概念的《福尼克斯报告》，作为大会的重要背景文献，也在大约一年前形成。因为那时中国的联合国地位还没有恢复，所以我们没有涉足大会的任何准备工作。大会秘书处原定的方案是，鉴于之前的准备，会议期间不对文稿进行大的讨论和修改，只做个别文字的修改，然后表决通过，所以在日程的安排上也只安排了一天的讨论时间。

尽管有不知情的原因，但是在我们中国代表团看来，《宣言》的背后仍是一场“人类在环境问题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场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中国绝不可能接受仅由少数国家操纵的《宣言》。所以，在会议开幕当天，中国代表团就联合一些亚非拉国家，向大会秘书处提出讨论修改《宣言》草案的要求。当即遭到起草《宣言》草案的二十七个国家的反对，他们坚持不能重开讨论。

会议的第三天，我们代表团向大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全体参会国共同对《宣言》草案进行讨论和修改。大会秘书处只好决定成立《宣言》特别工作组，重开对《宣言》的讨论。正是这一举动惹恼了美国总统尼克松。

围绕整个《宣言》草案进行的斗争可以说是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最重要的工作，也被我们认为是对此次会议最大的贡献。《宣言》草案包括二十六项原则，中国代表团提出要对其中的十项进行修改。最后，大会秘书处总共收到了一百一十多条修改建议。当然其中不乏中肯、专业和有建设性的建议。

中国代表团不仅引导大会对《宣言》进行修改，而且还创造性地把毛主席语录写进了《宣言》。比如，在第一部分的第三条里，我们加进了“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还有，第五条中的“世

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第六条中的“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原话。也就是在那个极左思潮年代的影响下，才会有非要把国家领导人的语录写进联合国文件的事情发生。

在我们提出的那些意见中，并不都是恰当正确的。比如说关于人口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当时不赞成一些国家提出的控制人口的说法。所以也才竭力把毛泽东的“人是最可宝贵的”的语录写进宣言。那时候，大多数国人的观点认为，人多是好事。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回头想想看，中国在这方面的认识是错误的。其实，不久以后中国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拉尔斯·恩格菲尔德是一位退休的瑞典外交官。作为大会筹备组成员，他参与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准备过程。他在回忆录中说，除了人口问题，中国代表团在核试验的问题上也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他们还是尽量寻求共同立场。”中国代表团坚持，在《宣言》里可以写上不使用核武器，但不能提禁止核试验。众所周知早在1963年，中国和法国已经拒绝参加美苏达成的在大气层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所以很多国家对中国在讨论中的立场并不诧异。最后作为妥协，核试验问题从《宣言》的第26项原则中抹掉。取而代之的是修改过的一段，“必须避免人类及其环境受到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的影响。各国必须努力在有关国际机构中就消除和完全销毁此类武器迅速达成协议。”虽然中国代表团仍不满意，“但此时他们的态度已经显得比较孤立，所以反对声并没有引起共鸣，修改过的这条便得以保留”。

如上面提到，针对《宣言》的主要讨论和谈判早在大会之前于1972年1月在纽约举行，达成共识后得以定稿，作为草案提交大会通过。中国政府没有参加这一过程，所以对情况不太了解。虽然我们在大会期间开启了对《宣言》的讨论，其实中国代表团已经有了投赞成票的决定。

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唐克的主旨发言中措辞稍微变了一下，把某些地区的公害问题归结于“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特别是由于超级大国疯狂推行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并且把“攻击的火力”集中在了美国身上。中国代表团发言后的第二天，瑞典的《每日新闻》说，“中国的讲话使美国处于慌乱……其攻击火力之强烈程度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中国代表团处处针对美国的发言确实把美国人惹恼了。美国代表团曾几次声

明要针对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召开说明会，抗辩中国代表团的攻击。而国内对中国代表团的这种做法其实也并不十分满意。把美国人惹急后，中央专门给代表团发了一封电报，指示说，在针对美国的问题上要有理、有节。

确实，毕竟尼克松总统刚刚访华，两国关系正破冰解冻。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一个以环境为主题的会议上处处针对美国，并不是明智之举。所以，后来在中国代表团提交给中央的总结报告中，也专门对这样的做法做出了检讨。

除了搞政治斗争外，我们究竟从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会议上学到了什么？斯德哥尔摩会议很重要的议程还包括要对环境质量、自然资源、污染物控制、环境教育、发展与环境、建立国际组织等六大内容进行研讨。代表团四十多位成员也分两组，一组是由团长、副团长和十多位“骨干”组成的修改“宣言”组。另外一组是不参加“宣言”修改的人，大约二十多人，分别参加大会的三个分会。分给曲格平先生的任务是，收集每天大家参加各个讨论组听到的对环境保护有价值的问题信息。他说，“遗憾的是，十多天里，我一条信息都没有收集到。当我挨个向大家询问有什么需要记录的信息时，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基本上听不懂。’也难怪，代表团里的四十多个人，除了我和江小珂以外，几乎没有人接触过环境问题。我们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代表团也没有经过必要的培训和准备。”

在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之前，曲格平先生曾经对渤海湾和官厅水库的污染做过一些调查，对环境现实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已经意识到中国已经出现了污染问题，也曾经向周总理提出应该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环境会议，把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总理同意了，但后来因为有斯德哥尔摩国际性的会议，国内的会议就暂时放下了。

斯德哥尔摩之行虽然证实了我国环境问题严重，应该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可是在代表团给中央的报告中绝口不提环境问题，全部内容都在谈政治斗争以及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此，曲格平先生一直心存不安。他回忆道，“我们中国派团出席的是环境会议，而向中央提交的报告却是政治斗争的内容，太离谱了。我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很严重，如果不抓住这次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契机推进环保事业，可能以后很难再找到合适的机会了。于是我就向代表团的副团长顾明同志建议，是不是还应该向周总理专门汇报一下环境的问题。顾明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并再三嘱咐要简短，最好归结简短的几句话。于是我将在环境会议期间对中国环

境污染及环境形势的思考归结为两句话：‘中国城市存在的环境污染，不比西方国家轻；自然生态方面的破坏程度，中国远在西方国家之上。’一开始，顾明也有顾虑，担心这样说会捅娄子，强调‘这不是代表团的意见，而是你个人的一种评价’。后来他还是同意给周总理汇报。总理听了我的对当时环境形势的判断后沉思许久说：令人担心的环境问题还是发生了，城市环境和自然生态破坏，这不就是全部环境问题吗？而且还很严重。他指示，立即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环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还得让全国各级领导都要重视。”

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1973年8月以国务院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会议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有没有环境污染和公害。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教条主义盛行，人们的思想被封闭，不愿也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环境公害，认为那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谁要是说中国有污染，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逻辑，可在当时这却是一个谁也不敢质疑的信条。但是，来自全国各地和各界的代表摆出的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环境问题，并且还很严重。可以说，这次会议惊醒了沉迷于“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人。会议之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从此，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在“动乱”中艰难起步了。

从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至今，人类走过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人类理性又一次觉醒和复苏，步履蹒跚地从工业文明向绿色文明迈进。回眸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在这颗星球上发生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其中包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巨变。虽说蓄积酝酿已久，但变化的凸显是1972年的人类环境大会之后开始的。

50年过去了，曲格平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讲到，“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代表团当时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在那个极左思潮控制神州大地的年代，我们能走出国门，踏上即将启动的人类环境保护的世代列车，实属不易。这个背后有着周恩来总理运筹帷幄的大智慧。”

【百年国史】

画说我的一生 (25)

——否定之否定

(1977-1981)

刘海鸥



1977年大学开始重新招生, 招考范围除了应届毕业生外, 还包括1966年以后被耽误了十年学业的历届学生。那些有志上大学的“老学生”重新拿起课本, 励精图治, 准备一搏。当年永丰中学就有三个年轻老师考上了大学, 均是重点大学。这三个人恰好都是北大附中的毕业生, 我这个老北大附中对他们羡慕之极, 特别是其中一个, 和我年龄一样大, 上学晚点, 是老高二的, 他有资格考, 我就没有, 我文革前高中毕业, 不在这次的招生范围, 心中无限惋惜。

1978年初, 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一天, 老宋从学校里拿来一张研究生的招生简章, 说你可以试试报考研究生。大学本科已经让我肃然起敬, 眼巴巴地望着它的门槛爬不上去, 更何谈研究生。我说绝对没可能。老宋坚持说可以考一个试试, 即使考不上也没有任何损失。我动心了。那时我已经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只

是想换个学校，离家近点，考研究生倒是一条途径。

考哪科呢？我接过招生简章，目光首先落在北大中文系，那是我高考那年的第一志愿，可是没有希望，那些必读书什么史什么学什么概论，听都没听过，更不知到哪儿去找。再看历史系，也不行。法律系更没门。只有哲学系还沾点边，起码《矛盾论》和《实践论》我看过，而且看过多次，在我的概念中哲学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我的选择无可奈何地落在了北大哲学系马列主义哲学史专业，就试试它吧。一看必读书，又是脑袋发晕，浑身冒汗：《两论》只是沧海一粟，要读马恩列斯毛和国内哲学家的主要哲学著作，要读世界史工运史共运史联共（布）党史，还要考数学和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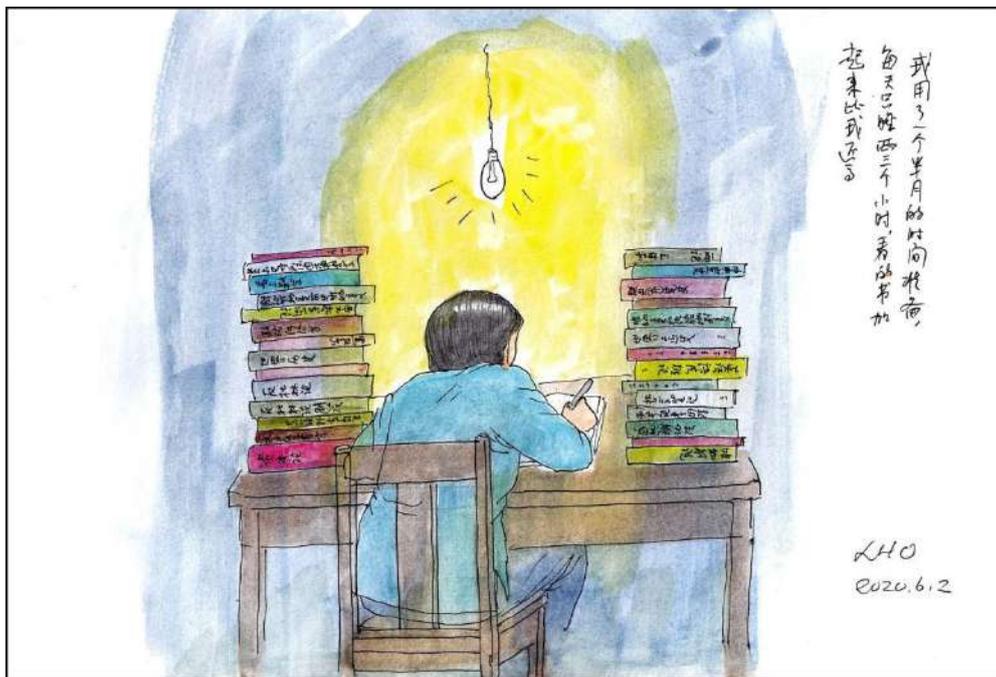
幸而那些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我家里全有，文革期间，文学书籍都抄了烧了，仅仅留下一柜子马恩列斯毛。



妈妈带我去请教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韩树英。1949年以前他是大连教育局副局长，妈妈是大连师范学校副校长，与他常有来往。韩树英问我，都读过什么哲学著作？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吗？没有。读过《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吗？没有。《反杜林论》？没有。《自然辩证法》？没有。《哲学笔记》？没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没有。那么至少应该读

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普及本吧？也没有。韩树英摇摇头：“这些书粗读也至少需要一年，你首先要细读一下我和艾思奇同志合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后年再考吧。”

我们又去找了爸爸的高中同学任继愈，他是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看来也是不以为然，只说那些东西得精读，有问题可以找他。



尽管专家们都说不行，我也要试一试。对我来说，考研究生的目标并非当个哲学家，而是换一种活法，更主要的是考我有多大潜能。自从大学落榜，我对自己的能力就失去了自信，尽管我知道那是因为我资质以外的原因。想到这一点，我就有一种摩拳擦掌的兴奋。学校里的好多人都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光看我，好像在等着看我的笑话。更有老师讥讽：“刘海鸥想考研究生？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管别人怎么说，既然我已经打算吃天鹅肉，好歹也要尝一尝。

我日夜兼程啃完了所有的必读马列经典著作，写满了两个笔记本，记住了世界史工运史共运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时间过程结果意义，做完了高中三年的数学题，背下了一本英语语法书。白天还要上课，这一切主要是用晚上时间，我几乎每晚都读通宵，只是在凌晨三四点钟最困的时候迷糊一阵。



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背英语单词，骑车回家时手持一个英语单词小本，一路背诵。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完成了全部学习。整理书本带回家时，才发现我这一个多月读的书加起来竟有一米多高。最让我骄傲的是，我的体重达到了我历史上最辉煌的数字，106斤，减了二十多斤。就为这个，考不上也值得。



应考那天，北大图书馆考场前拥着上千男女考生，多是文革前那几届的老大

学生，个个气度不凡，胸有成竹。见此阵仗，我竟头一晕，坐在台阶上喘息了一会儿。待第一门课的考卷拿到手里，心才平静下来，不难，答案都可以在我看过的书里找到。

几门专业课的考试发挥得很好，唯一知道的错误是把被恩格斯誉为新世纪曙光的旦丁写成海涅。考完专业课，心已放下了一大半。



英语考试允许带字典。进入考场，吓了我一跳，只见人人都带了一两本辞海那么大的英汉词典，见都没见过，而我只带着巴掌大小的郑易里的袖珍字典。凭着这个小字典，竟也啃完了一篇列宁和第三国际的文章。

数学也不难，感谢北大附中的数学课，我那时虽不用心学，基础也够扎实。十三年过去了，连解析几何都还能对付，只是忘记了一个算利率的公式，问的是一笔存款二十年后增长到多少，我只好一年一年利滚利地手算（那时连个计算器都没有），算了一个钟头才得出答案。

如果考题我都能答出，对那些老大学生们不更是易如反掌？考完试回家睡了一天，不再抱什么希望。

一个多月后，一天早上一群坐公交车上班的老师到校后，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你考上研究生了！你考第一。”他们哪儿来的消息？原来永丰公社某小学有个老师的丈夫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师，负责招生，看到我的考试总分第一，想不到永

丰公社还“藏龙卧虎”，就问他的妻子是否认识刘海鸥这么一个人。一般来说，全公社的中小学教师经常一块开会学习，不认识也知道。小学老师在车上把这消息告诉了中学老师。

我将信将疑，不敢高兴，直到收到了成绩单和复试通知。我的专业成绩平平，才78分，是数学（83分）和外语（61分）给我帮了大忙，这两门虽然分数也不高，但是有些考生专业成绩拔尖，数学不及格，外语零分。



复试是写一篇命题论文。那阵刚刚冒出了一个新提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还颇有争议。参加复试那天早上，骑车经过清华大学，听见学校的大喇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边骑车边听了两耳朵，记住了几句关键的话。复试的论文题目竟然是《论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不知从何而降神来之笔，一气呵成写了三四千字。纸不够用，要了一张又一张，把监考老师都逗笑了。后来我的指导教师黄楠森先生跟我说过几次：“我真佩服你，考试三个小时的时间，你竟能写出四千字的论文，我是做不到的。”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复试成绩又是我第一。

口试由郭罗基先生主考，问我如何看待中国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在改朝换代中的作用。过去我们学过的观点，基本持批判态度。我一高兴，大胆地发表了一个文革中被彻底批判，当时还未被“正名”的观点：中国统治阶级在改朝换

代中的“让步政策”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我被录取了。一切都出于偶然性，如果不是丈夫发现一张招生简章，如果不是恰巧家里有马恩列斯的书，如果不是听见两耳朵大喇叭播的社论，我也许至今与哲学无缘。

我收到了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终于在31岁时跨进了大学的校门。



我对研究生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该怎么读。第一次开会时黄先生问我们各自准备研究什么题目，我说：“我想研究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把大家逗笑了。我实际想说的是，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刚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平反了文革中重大的与高层领导的有关案件，从根本上架空了文化革命“成果”，也就是说文革没有一件事是正确的（后来198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以文字决议的形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我实际上是困惑的，因为否定文革就是对我这十年生命的否定，这十年我即使没有百分之百也至少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青春精力热情投入了文革之中。我几乎脱胎换骨地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按照文革给我们指定的标准所变的新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士，然后一下子这些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就像文革开始时一样，我又要否定自己的一切作为，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尽管没有人

要求我这样做，尽管这样做是痛苦的。但是我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翻来覆去，我必须搞明白，为什么我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民能够一呼百应地疯狂地投入这个错误的运动，这和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有什么关系。若是再碰上一次这样的革命（老毛说“这样的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我不能再把自己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了。

我的问题尚不属于当时哲学系所研究的范围，只能暂时存疑。

哲学系共招了三十几个研究生，分别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在“马哲史”班，有七个研究生，三个老大学生，两个工农兵学员，两个（包括我）高中毕业生。读研的三年中，有一个同学因为精神问题退学，一个同学中途出国。最后五个人完成学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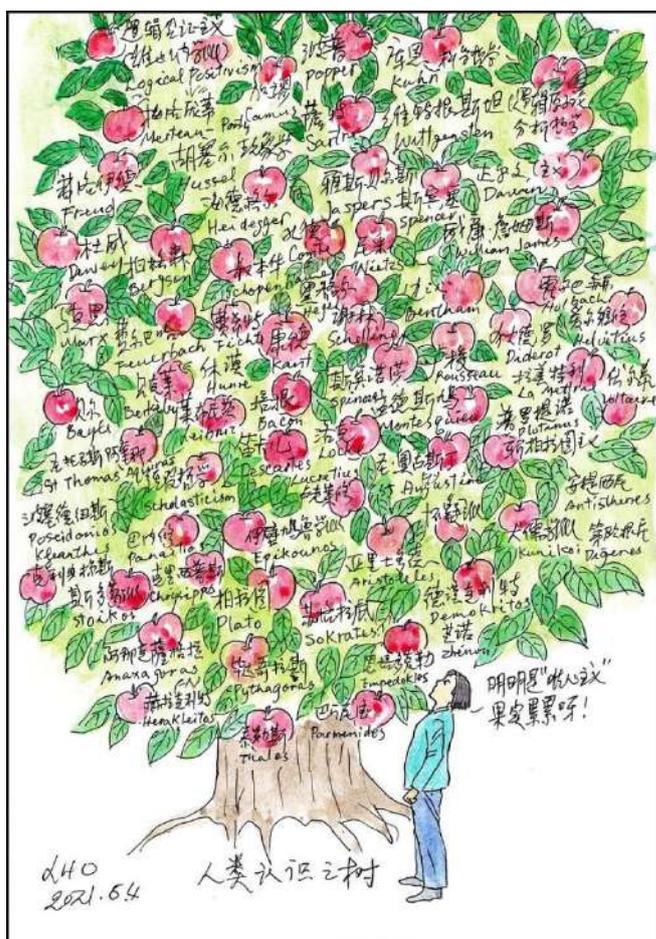
我们的导师有黄楠森（本应是“黄柎森”，但多数人读错柎字，无奈只好改名）先生、郭罗基先生、宋一秀先生。我非常荣幸地被黄楠森先生收为研究生弟子，他看上了我复试的答卷，把我的研究方向定为马克思主义认识史，黄先生在这个领域有相当高的造诣。

我们的课程为小组授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大小逻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宗教史、逻辑学、美学、美术史、第二外语（我选了德语）。没上过大学的还要和本科生一起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工运史，还有高等数学等大课，以补足哲学本科的基础知识。

在小组授课中，教授们的讲授不再是给本科生讲大课那样中规中矩，常常有一些自己的闪光思想和大胆论证。最敢于发表异端见解的是郭罗基先生，这位先生个子矮小精致，带着同样精致的眼镜，有一种漠视一切的神态。我的入学口试时就是他主持的，当时感觉他盛气凌人，所提问题也比较刁钻，好在我应付过来了。他授课不按常理出牌，讲的几乎都是社会政治问题，提倡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其观点新颖大胆，敢说当时没人敢说的话。听他的课收获最大，那真是一种精神刺激，让我的思路大开，并有一种重新审视一切的跃跃欲试的冲动。他的这些观点后来系统地写成几篇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等在1979年的《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惹怒了邓小平，下令将其逐出北京，郭罗基拒不从命。1982年邓小平再次下驱逐令，并责令中宣部和北大党委发动对他的批判运动，郭罗基全家最终被放逐南京。当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为郭先生感到不平，我所能做的是写了一封支持他

的信，并寄去了一个精美的挂历。1989年“六四”后，他被取消党员资格、教授资格和授课资格。最后被迫远走他国。

黄先生的课也好，他在1957年曾经被划为右派，仍是坚持真理，他给我们讲他学术研究的见地，学问扎实，不落窠臼。他为人平和，表达观点时也是不露锋芒，但绵里藏针。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我学习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除了细读马列著作，还认真阅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做了大量的读书心得笔记。后来我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哲学又发生了浓厚兴趣，以我的自然科学基础弄明白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们的理论对我认识问题的方法大有启迪。

我发觉我最喜欢的课是汤一介先生和朱德生先生的西方哲学史。它给我呈现了一个人类大智慧的发展历程，相比起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只能算是这

棵智慧之树上的一根枝丫。而这棵树上的另一根枝子——唯心主义令我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一贯的宣传让唯心主义变成了一个万恶之源的标签，在“工农兵学哲学”的大批判中，一切坏事情的思想根源都是由此产生。唯心主义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过是政治偏见所绑架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在对唯心主义批判的同时培养了人们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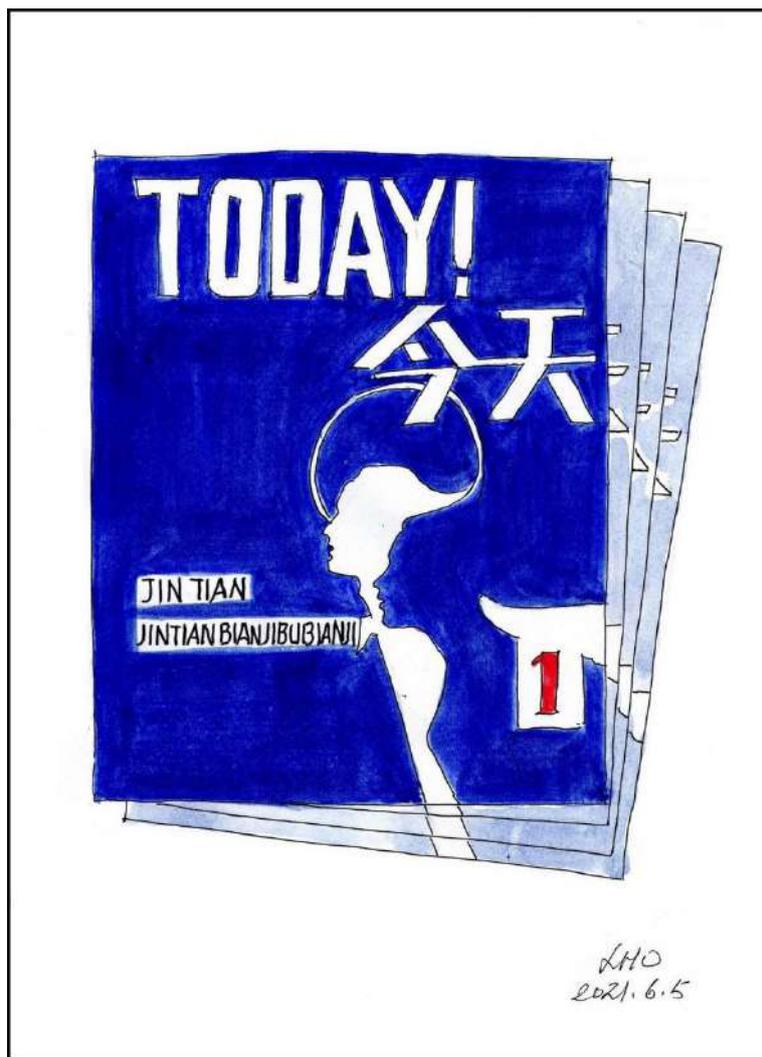
恩格斯说唯心主义是人类智慧之树上不结果的花朵（大意），读了西方哲学史才发现唯心主义的产生发展不仅是花朵，而且果实丰硕，在某种程度上唯物主义也是它的果实之一。对唯心主义的公允评价哲学史上早有之，我国的哲学工作者早期也有过论述，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哲学体系完全照搬苏联，对所谓的

资产阶级哲学体系及其研究者持批判态度。同时，唯物主义在历史上也不是永远带着神圣的光环，他产生时就带自身瑕疵——机械性。尽管后来有辩证法辅佐，仍然难以避免武断的决定论，从而导致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否定。

我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重新认识，在今天已经是哲学最一般的常识，但那时对我来说不仅是重大发现，而且开始动摇了二十多年来灌输给我们的对某种思想体系的信念，动摇了我已经形成的融化在阶级划分中的黑白思维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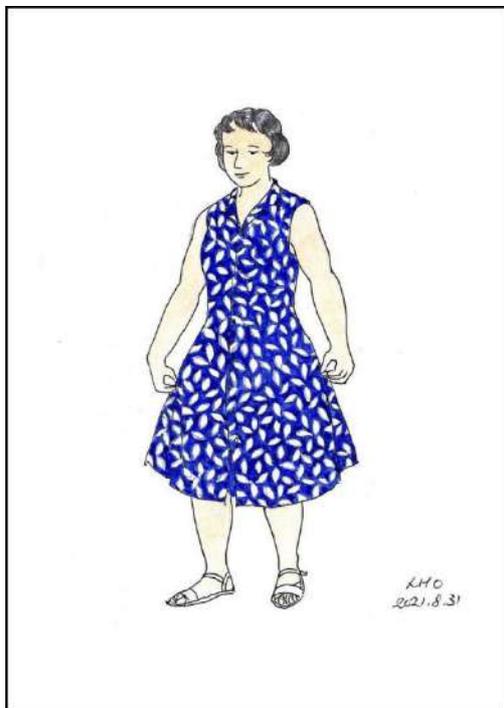
从1978年到1981年读研究生的这三年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又进入了新一轮百家争鸣的时代。新思想和旧势力你争我夺，你上我下，异常活跃。民主启蒙运动已经开始，“西单墙”就是一个象征。所谓“西单墙”最初是张贴的是天安门诗抄，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刚一出版就被汪东兴下令查禁，理由极为无稽——上面刊登了天安门诗抄，而没有老毛诗词和华国锋题词；还登载了“破除现代迷信”的文章。有人把这期杂志的内容贴在了西单墙上，引来千万人观看，展开讨论，进而出现要求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大字报。后来魏京生贴出批邓小平独裁路线，提倡政治民主化的大字报，事情就起了变化，魏京生被捕，西单墙被取缔，“四大”被取缔，旧势力重占上风。



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有一朵浪花是自由派文人掀起。1978年我看到了一本手刻蜡板油印杂志，叫《今天》，由北岛等人创建（当时并不知道北岛为何人）。翻看杂志，我立刻被镇住了，其中的小说诗歌与建国三十年来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一样，也可能是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派，但是我在《今天》看到的是面目一新的作品。我迫不及待地订了这份杂志，1978年12月第一期，还附送一张照片，一束逆光的芦苇。《今天》杂志里有很多社会批判的思考和谈话，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赵振开（北岛）的小说《波动》，讲的是以文革为背景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不同于其它悲悲戚戚发泄愤怒的伤痕文学，小说开放式地描述正常的爱的感情，以人性的魅力冲击着读者的心灵。写作手法也别具一格，以不同人物的叙述为结构，小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今天》出到1980年七月第九期就被迫停刊。这九本杂志我一直珍藏着，直到离开中国。



中国国门终于遮遮掩掩向世界打开了一条缝隙，外面的东西立刻蜂拥而入。惠及普罗大众的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变化，妈妈的弟弟我们在香港的大舅汪华祚，就像是这个变化的使者。七十年代末他从香港来北京探望妈妈，那是他们分别几十年后第一次相见。大舅带来满满一箱子港货——乔其纱连衣裙、蛤蟆镜、砖头式录音机、大量的华语粤语流行歌曲磁带，从邓丽君的全套歌曲到《鬼马歌》（后者妈妈竟然喜欢听）……



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大舅带来的裙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乔其纱连衣裙，简直不好意思穿出来。一个同事见到了不由分说，强行拿她的一条裙子“换”走了这条连衣裙。不管怎么说，我敢于穿裙子了，从刚开始试试探探的过膝半截裙到后来自己设计和缝制的无袖连衣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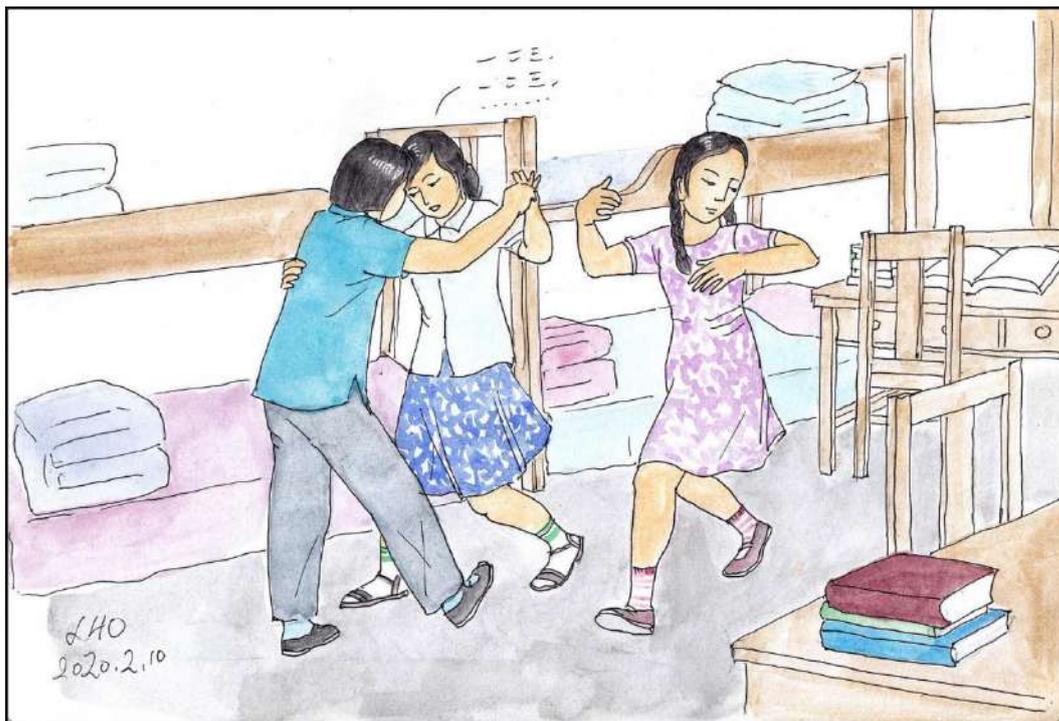
终于突破了蓝衣服灰裤子的束缚。

还有，一种已经消失了十几年的发型在市面上流行起来——卷发。我也未能免俗地烫了头发。



音乐对我冲击最大的可能算是邓丽君的歌曲，在她之前我曾听过上海的朱逢博唱喜儿，已经吓了一跳，绵软柔和，与文革样板戏中喜儿刚烈的演唱大相径庭，隐约觉得这不唱成了靡靡之音吗？邓丽君的歌不止软绵绵，歌词也都是你情我爱。刚从不允许公开讲爱情的时代走过来的我们，被这些歌曲搅和得惶惑不已。听着邓丽君的歌我心中总有两种东西在打架——十几年来已从耳际植入大脑的铿锵强健的声音和突然冒出来的柔软优美的音调，该抗拒哪个接受哪个呢？有一次我把砖头收录机和邓丽君歌曲磁带带到宿舍给同学听，一会隔壁中文系的研究生来敲门，满脸严肃地请我们降低音量。其实我们播放的声音一点也不高，夏天各宿舍都敞着门，歌声四处流荡，看来困惑的不止我一个。

收录机给我带来的不只是邓丽君，更有销声匿迹十多年的西方古典音乐。一天同宿舍的丁东红带来一个磁带给我们播放，太好听了，乐曲一开始就把我们的情绪带到一个辉煌的顶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那时收音机里还很少播送外国音乐，音乐爱好者们不知从什么途径用磁带录制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音乐大师们的杰作，然后就像文革中的手抄小说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互相拷贝。有一个公派留学日本的朋友归国后，借给我一大堆在日本电台转录的古典音乐，包括贝多芬全套的交响乐和钢琴奏鸣曲，音质虽然很差，还是让我如醉如痴。



改革开放带来的另一个冲击是交谊舞。1979年北大学生会贴出一张告示——某月某日在第一食堂举办一场大型交谊舞会。“交谊舞”，这几乎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同义语（我们叫“交际舞”，更有些暧昧的意思）。文革前几年交谊舞在一浪接一浪的阶级斗争中就已经绝迹民间，只有州官有权放火——“三座门”、中南海的舞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据参加者说，江青场场必到，当她一出现在舞场，乐队立即奏响《我的太阳》。

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学交谊舞会，同宿舍西哲史的女生们兴奋不已，老早就在议论此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惜我们这一代人均均为舞盲，没人会跳，干着急。丁同学周末回家跟人学了三步四步，回到宿舍拉着我们一个个地教，教的也笨，学的也笨。舞会那天，室友们早早打扮整齐，穿上花裙子，抹上口红相约而去。我也非常想去，哪怕是看看热闹也行，又自惭形秽，顾虑重重，怕自己岁数太大被人笑话；怕自己身材不好，叫人看不上；更怕自己的身份（马列主义哲学研究生）不合时宜。前思后想，终于没敢去，只能等着听室友回来汇报（据说她们也只是干站着看，没有舞伴）。舞会后我们系研究生有党员干部批评：竟有党员参加交谊舞会，又表扬了我们马哲史研究生没有一个参加。这么一来，我只好收回了跳舞的那颗心，继续假扮一个马列主义的卫道士，尽管心里无限羡慕那些在舞场飞来飞去的大胆女孩。



从“门缝”挤进来的外国电影给我打开了又一个世界，文革中很多年只有样板戏的电影，几乎全国人民都能唱整出样板戏，还有就是反复上映的战争教学片《地道战》《地雷战》以及几部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的片子，连小孩子们都谙熟其中对白。文革后期终于拍了几部“故事片”《春苗》《海岛女民兵》等，和样板戏一样，千篇一律的单身工农兵和地主资产阶级坏分子斗争并取得胜利。

文革中有一种电影叫“内部参考片”，无论封资修，哪国的都有，专门放给毛泽东江青，还有高干及其子弟过瘾的，一般民众只能反复地看那几部外国革命影片。有一次有两部内参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的票子竟也下放至我们永丰中学，但那是因备战的需要而教育民众，并且只能党员干部，出身纯正者和积极分子去看，像我这样的群众只能留在单位学习《毛选》。

八十年代初仍然没有多少外国影片上映，但是观看“内参片”的范围扩大了一些，特别是惠及了“文化人”。爸爸常常能得到内部电影展的票，自己不去，给了我们。我第一次看的“内参片”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1949年以后中国只放映过一部美国电影，片名忘记了，黑白片，是讲工人罢工的左派影片，看得我只想中途退场。而《音乐之声》给我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震撼”，原来美帝的歌曲那么好听，原来美帝也表现那么纯洁的爱情，原来美帝也反法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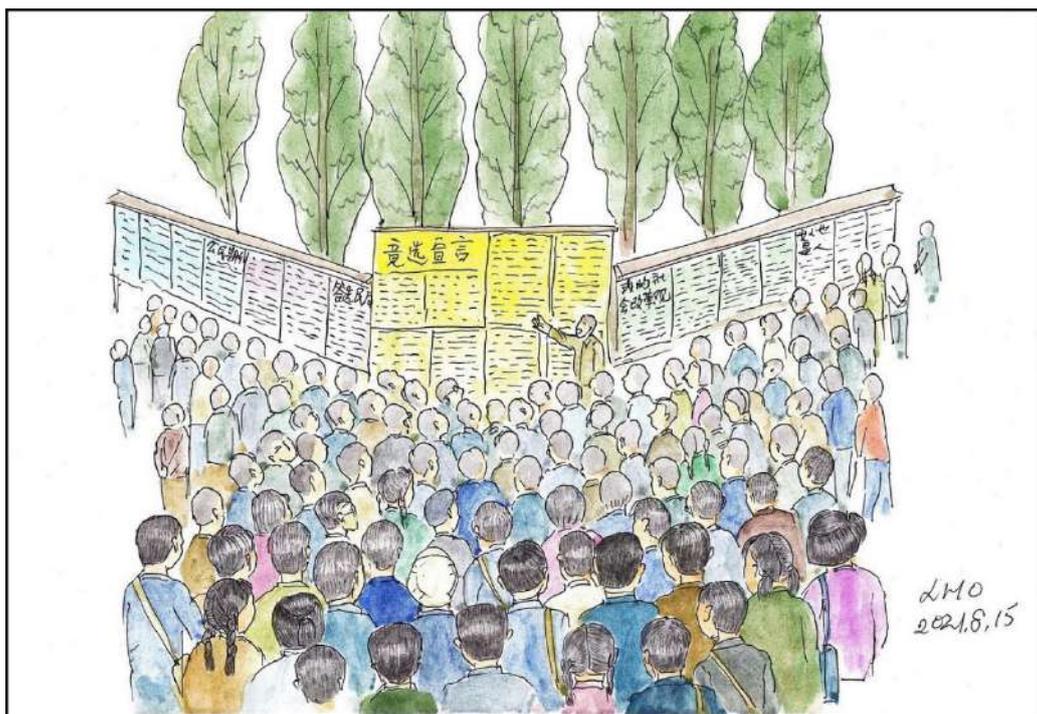
那些穷凶极恶的面孔隐藏在哪里呢？这与我们接受的教育相去何其远！这部电影是不朽的经典，我出国以后又多次观看，百看不厌。我还看了“内参片”苏联的《战争与和平》，四部巨制，其人物刻画的精准（和我看书时脑子里的人物形象一样！）和场面的宏大独一无二，只有苏联才能做到。久违了，伴随我们长大的苏联电影；久违了，我最崇拜的苏联演员邦达尔丘克（为电影《战争与和平》的编剧及导演，并饰演彼埃尔）；久违了，吉洪诺夫（饰演我最喜爱的安德烈。早在少女时期看了他主演的《海军少尉巴宁》，曾让我心灵久久震颤）；久违了，上译厂一众优秀配音演员。我们落后了世界有多远多远呀！



性开放对中国人也是一大冲击，人们已经被十年八个样板戏中没有家庭没有配偶的中性人折磨得几乎性无能。我们中学有个老师是从兵团回来的知青，她和男朋友准备结婚时，才刚有了初吻的举动。本来她根本不知道结婚后要干什么，接吻时她感到了男友身体的异动，就突然联想到了兵团的公猪交配时的样子，恍然大悟，原来人发情的身体反应也和猪一样。跟我们一说，没把我们笑死。更有甚者，我同宿舍的老师结婚一年多没有怀孕，老唠叨不知为什么怀不上，我劝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从医院回来说：“臊死人了，医生说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我说：“姑奶奶，您这一年晚上都干嘛了？”一个小单位就这两档子笑话，全国人民中这种事例定不在少数。

打开国门一看才知道电影里外国人刚一认识就上床，原来人们可以那样生活，可以那样做爱。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呢？

北大一些学子也有点闻风而动的冲动。一天我在校园里骑车，碰上同向而骑的一个研究生，就聊起天来。他告我：“我正在研究性问题，我看了很多外文书籍，发现我们对性的了解落后于西方社会几十年。现在西方人对性是非常开放的，他们可以经常更换性伴侣。性和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脱节的，而且不牵涉道德问题……”他问我：“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想了一下：“我赞成性一定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不过根据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感情这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爱情发生变化或者已经不存在，那就可能有两种结果，离婚或产生婚外情。”他说：“你说得太有道理了，我们应该深入地谈一谈。这样，你今天晚上到我宿舍来，我们宿舍没人，我们好好聊聊。”看着他激动得迫不及待的样子，我噢了一声就骑走了，心里“哼哼”冷笑两声，等着去吧。



文革时期北大和清华两所中国最知名高校以“梁效”之名成为毛及其班子“四人帮”的代言人。在我上学之际，思想和学术的自由空气再度回到这个具有民主传统的校园。思想解放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80年的竞选。那年上面似乎在进一步退两步地试图迈出政治改革的步伐，其中一步就是选举法的重新修订——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这一小步在全国多所高校的师生们掀起了

一场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北大更是当仁不让。

北大校园内有一块空地，被称为“三角地”，因近食堂，学生集中，通常学校及学生会的告示在此发布。反右运动之初，热血青年在此以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宣讲自己的主张，多数活跃分子被打成学生右派，此后三角地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自由竞选又使这块地方活跃起来，许多热心有见识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站出来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在三角地发表他们的竞选宣言。一时间大字报、答辩会、民意调查热闹非凡。讨论的题目涉及评议文革，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评价毛泽东、改革之路、人性解放……已经远远超过了人大代表所要考虑的事情，三角地再次成为北大精神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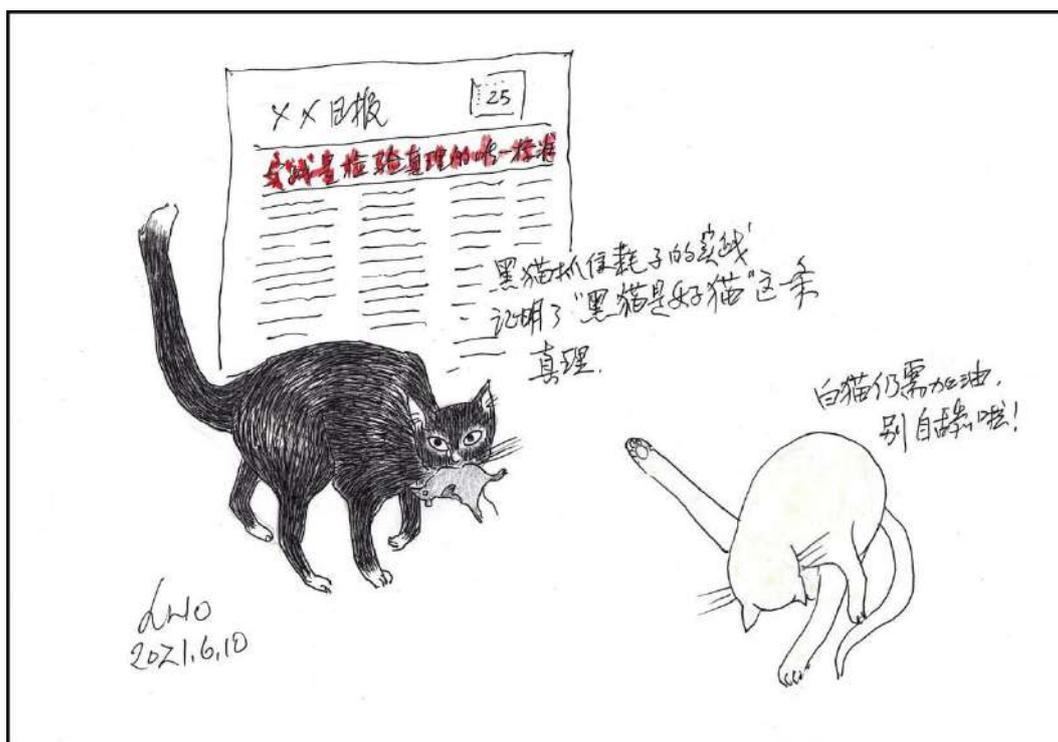
哲学系西哲史研究生胡平参加了竞选。他的竞选宣言是《论言论自由》，一石激起千层浪，为此在大食堂召开了千人答辩会。

胡平经常到我们宿舍来高谈阔论，我同宿舍的另外两个人都是西哲史研究生，与胡平关系很好。我觉得他是个很傲气的人，有一次听哲学大课，我头不抬手不停地做着笔记，胡平双手抱胸坐在我旁边，非常不屑地给了我一句：“我从来不记笔记，真不知道你们都记些什么，都是书上的话。”由此我知道我和他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的。

哲学系的研究生为胡平的竞选组成了一个十一人的支援团，我没有参与，甚至整个学生竞选活动我都没有十分关注，不是因为反对，而是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那时真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用当时时髦的语言说就是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我们马哲史的研究生都保持沉默，有些人不一定是“补时光”，而是对“竞选”这个资本主义的玩意儿不敢苟同，至少是持观望态度。有一个同学甚至贴出长篇大字报，字字句句驳斥胡平的观点。

有一天我们马哲史的研究生被党支部叫到学校某个地方，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赞扬了我们在竞选中所持的态度（不参与，不支持），又要求我们注意观察那些竞选活跃分子的动向，及时向组织汇报。我又闻到了文革的气味，我保持沉默。

胡平成功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上面的政改试验又到了退两步的阶段，因为参加竞选胡平毕业后竟然没有单位敢接收他，失业一年多，最后终于分到了一个不对口的小单位。他几年后出国，现在是在美国知名的民运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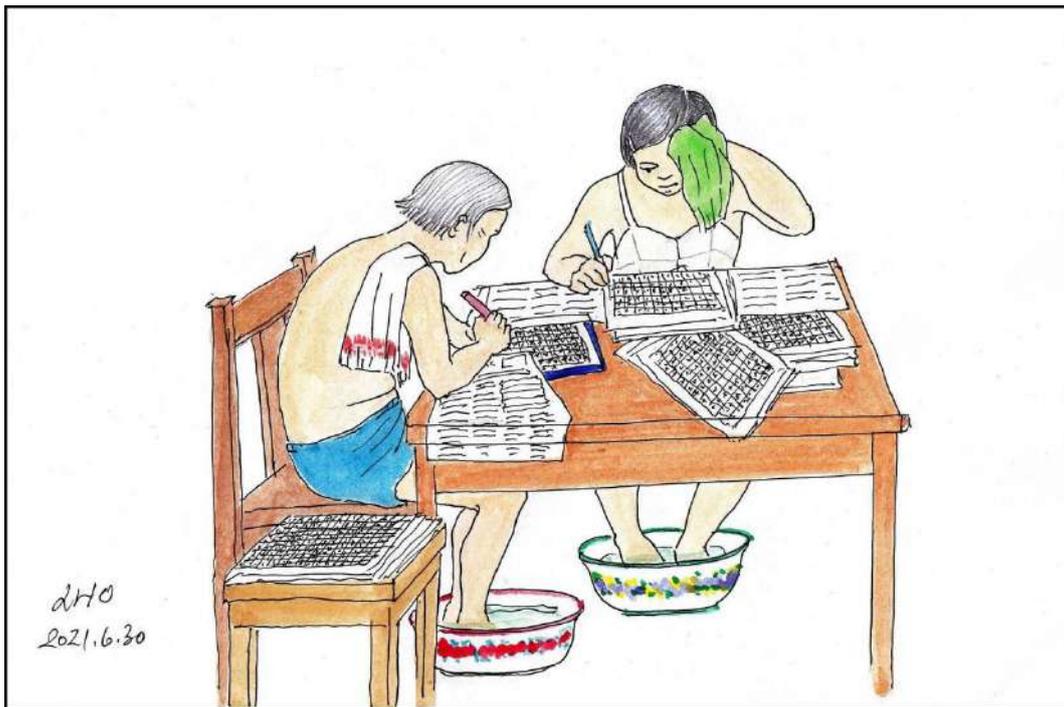


转眼就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了，选题时黄先生说，你复试写的“论检验真理的标准”很不错，你就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吧。两年的学习，已经使我在认真思考每一个命题。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并

不完全科学：如果说实践活动是一种标准，如同说吃饭是检验饭菜是否好吃或胃口好坏的唯一标准，睡觉是检验神经功能或睡觉环境的唯一标准，从语法和理论上都说不上；如果说实践**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法上可站得住脚，而理论上和前一命题一样隐含着唯经验主义的导向，实际上“黑猫白猫论”就是这条命题的通俗表述，“黑猫白猫”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时代是改善民生的权宜之计，但长此以往，它可能会导致实用主义的社会后果。这是我论文的基本思想（现在看来又有给X某“递刀子”之嫌，中国的理论研究就是这样的危险，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1980年全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会议在四川乐山召开，黄先生带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者全都是中国哲学界顶级大腕，高谈阔论，应接不暇，我不敢在大师们面前发言，认真听着，听来听去无非是给“实践标准”找出哲学理论的根据。

休会时间，黄先生在乐山大佛山顶的亭子里跟我谈论我的论文，一章章地分析。总体来说，他赞成我的观点，并给我提出修改意见，使论述更臻完整。



1981年的七月我在妈妈家写最后一稿论文，这时我已经怀了第二个孩子四个月。这一年遇上罕见的酷暑，巨热而且闷湿，汗水蒸发不掉浑身粘嗒嗒的，我和妈妈干脆打赤膊。我写，妈妈帮我抄。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完全靠手写，汗如雨下，胳膊下垫了厚厚一层报纸，以防汗水打湿稿纸，一会儿就要换一叠报纸。

晚上，地上铺一张席子睡觉，仍是热得睡不着。终于在七月的最后一两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天气立时凉快下来，我的论文也完成了。

论文答辩时，中国研究马哲的“泰斗”们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不记得是什么问题了，只记得我侃侃而谈，一个问题也没难住我。当然通过了，也许成绩还不错，因为我被列在了留校的名单上，是马哲史研究生唯一的一个。这个夏天在我脑子里只留下了几个印象——酷热、席地而睡、妈妈赤身抄论文……我不记得我曾对妈妈说过一个谢字，可能还因为心烦和她争执过，现在想起来多么对不起她呀。

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弊端，从理论上说与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无关系。至今没有人（也可能有，我没看到）反思这个问题。当年我是怎样论述的已经记不得了。我曾自己留了一份论文稿，出国时没有带走，体院收回我们的宿舍时，被人卖了废纸。2015年我去了一趟北大图书馆，想在研究生论文档案室里搜寻我的论文（用复写纸抄了一式三份），但是没有存档，在我们之前的研究生论文根本没有，只能感叹当年的文档制度太不健全。

我的观点如投入深潭的小石子，无声无息。



写完论文就是等待分配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非常抢手，中直机构早已经派人来物色对象。我们的分配方向绝对错不了。我没考虑去什么单位，离开永

丰我已经十分满足，更加不可告人的是我已经“偷偷”怀上二胎，那时候已经是严重违纪甚至“违法”的事情，我非常的低调，希望不要引起任何人注意。一天在校园里碰见给我们上英语课的教授，开口就说：“恭喜你呀！”我说：“恭喜什么事？”他说：“你还不知道吗？你留校了。”感谢黄先生对我垂青，我心里却因为“二胎”一事充满不安。正式公布分配方案时，我被分到《红旗》杂志社工作。有人告诉我“你留校的位置被人顶了”，我根本不在乎，对那个人（他已经向我道歉了）一点怨言也没有，反而心里坦然了，要不然怀孕事发怎么面对黄先生和北大的信任。

我知道自己其实不适合学哲学，没有严密周全的头脑，没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且感情用事逻辑混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读上三五页就睡着了，醒来接着读，读读睡睡，睡睡读读。读完了，问我讲的是是什么，不知道。至今三年研究生学到的东西早已化为一团烟雾，在眼前消散。脑子里只模模糊糊留下几个哲学家的影子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哲学箴言。

但是我非常感谢（当年的）北大的自由空气，感谢（当年的）北大教授的开放思想，从这里开始，我的“思想改造”进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过去十几年洗脑的否定，我终于一点一点地找回了自己，尽管这又花费了我若干年的时间。📌

【评论】

季羨林谬矣，聂元梓岂能“为所欲为”

——兼谈聂元梓与校文革的执政能力

梁幼志

北大教师干部的文革回忆录，如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贺剑城的《亲历北大六十年》，陈哲人的《我在北大六十年》，袁向东《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颜品忠《“文革”记忆——一个北京大学普通教师的动乱经历》等，或多或少都提到了聂元梓，说她好的没有，不骂她的罕见。

骂聂元梓最凶有两位，一位是哲学系的讲师颜品忠，一位是东语系的系主任、

一级教授季羨林。这两位都上了井冈山，都是反聂派，都受过迫害，对聂都怀抱着经四十年而不减的大恨深仇。因此，他们骂起聂来，不顾事实，不求甚解，怎么解恨怎么来。与颜品忠相比，季羨林之骂更痛快淋漓，更吸引眼球。有抽象概括，有具体事例，比如：“（老佛爷）“为所欲为，骄横恣纵。”（季羨林《牛棚杂忆》，页41）“目空一切”（页46）“炙手可热”“倒行逆施”。这是抽象的概括，“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自序，6-7）。“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面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矛下的中学生。”（页46）这是具体例证。

季羨林在这里说的是聂元梓的领导力，这是文革研究中一个被忽略，但普遍存在的问题。季羨林说聂元梓是“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骄横恣纵。”（季羨林，2009，41）一半是无知，一半是泄愤。说季先生无知与泄愤，是因为他完全忘记了聂执政期间，不但北大，全国的党政机构都瘫痪了。即使聂元梓想“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也办不到。没有了党组织撑腰，即使是季羨林上台，北大该乱还会乱。也就是说，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力是低下的，贫弱的。凭着这种领导力，北大只能是乱成一团。

领导力就是执政能力，领导力的基础是法定权力。聂和校文革是北大师生根据毛的意志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聂和校文革的法定权力来自毛。毛和中央文革可以根据政治需要和聂和校文革的表现，随时削弱、打击、收回这个权力，而聂和校文革的温和性、保守性和疏离性，⁴⁷又为这种削弱、打击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尽管为了维护这个样板，中央高层与它还保持着脆弱的联盟，但是中央文革对聂元梓不断地打压，也足以鼓舞反聂派。尤其是陈伯达的1967年的“65”讲话，不但造成了校文革的分裂，而且使周培源等上百名干部重新站队。聂和校文革的“维持会”更加摇摇欲坠。

领导力的强弱取决于执行权，执行权就是行政权。从权力分类的角度看，行

⁴⁷ 杨子浪在《北大文革的三大特点》一文中，谈到：“校文革各部门和下属的各系文革也都掌握在中共党员手中，他们中的多数是‘社教左派’。虽然校文革几经分裂、改选，但基本成分没有变。这些人处理问题‘相对成熟稳健’，不像学生领袖那样‘容易调教’。”（见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二）香港，时代文献，2019，第83页。）正是因为“成熟稳健”，所以，聂元梓和校文革被激进派视为保守。

政权是一种强制性权力，“强制权是一个人的决定，要求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服从并执行，如果不服从和执行，就要受到惩罚。职位可以产生权力，当一个人自愿服从上级或领导人的决定时，这种自愿的背后，有强制权、奖酬权、信服权在起作用。”（严家祺《国家首脑终身制》，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19，21页）也就是说，不服从行政决定、指令或命令将会受到惩罚。

强制权的强弱，在于惩罚权。聂和校文革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惩罚权：开除不听话的常委，给反对派扣帽子，校刊点名，大会批斗；遵照周恩来、康生的指示，将杨勋姐弟送到公安局；依照《公安六条》，对井、红的头头魏秀芳等搞打砸抢的人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扭送公安局）；设立专案组，对本校的反对派搞政治迫害和刑讯逼供，以及坐视新北大公社动用武力对抗和征伐本校的反对派等等。

但是，聂和校文革的强制性权力是缺损的、畸形的、先天不足的。1957年10月，陆平搞右派补课，一声令下，即补划右派分子173人。使北大的右派分子达到699人（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1964年，陆平一纸批文，即将陈华贤、麦结华等多名“反动学生”开除学籍，逐回老家。⁴⁸因为陆平后面有北京市委和党中央。

63军在北大搞“清队”，仅8个月就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542人定为敌我矛盾，比校文革时期揪斗的218人还多324人。（谢甲林，2013，42）这种“清队”使自杀人数急剧上升，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有24人自杀身亡。就连毛泽东关照过的“红色史学家”翦伯赞夫妇也被逼服药自尽。犯下如此重大罪错的63军的总指挥刘信，因为有毛的党中央撑腰，也不过是做个检查了事。

党团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是强制性权力的左右手，是惩罚权的具体执行者。校文革时期党团系统停止活动，各系处室被派性所扰，难以整合。校文革无法通过惩罚不服从的一派，行使自己的强制权。为了强化执政能力，聂将孙蓬一从校文革的普通委员提拔为第一副主任，但是孙蓬一同样不能改变上述状况。

校文革可依赖的力量来自新北大公社、专案组、保卫组。但是，聂和校文革对这三个机构，既不能保护，又不能完全掌控——保卫组的“黑材料”被抄，负责人被打，一度关门。聂和校文革束手无策。专案组搞逼供信，聂派人制止，专

⁴⁸ 徐明曜《红色教育（1959~1965）——北京大学：最后两年的检查与批判》（《记忆》季刊2020年第二卷第二期，美国华忆出版社，第162页）作者在此文中将陈华贤写为陈XX。陈的真实姓名是陈华贤，见徐明曜1965年4月12日写的《毕业时的个人总结》未刊稿。麦结华为北大59级数学一班学生，1964年被打成“反动学生”，遣返回乡。详见麦结华《被北大开除之后——1964年后的下层生活》（《记忆》，304期）。

案组置若罔闻。“新北大公社”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聂怕有过激行为，派人劝阻无效，武斗照样进行。武斗中，殷文杰被杀，聂要求惩办凶手，公社战斗团的绝大多数团长都坚决反对。

强制性权力需要垄断舆论，一统思想。而聂和校文革却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武器。反对派师生可以随时给他们贴大字报，可以建立自己的广播站，可以刊发自己的校刊。垄断舆论需要封闭的环境，聂和校文革非但不能阻止社会的信息在校内的传播，反而还必须主动地向校内传播中央首长的讲话。

校文革不敢切断反对派的经济来源（教师的工资和学生的助学金），不能抛弃工作组时期留下的遗产，不能撤换抗命的系文革主任，不能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师生。因此，尽管聂与校文革充分利用了惩罚权，仍然无法统一全校的意志，无法扭转下属单位自行其是的局面，无法终止校内的无政府状况。校文革虽然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反对派砸了《新北大》编辑部，抢了广播器材，组建了“新北大井冈山”，聂与校文革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的不是一个聂元梓，所有的基层领导都执政能力低下。这不是基层领导个人能力大小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中国政治文化生态的问题。生活在贫陋之地的人们会患克山病，长期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会得尘肺，52年的“伦敦烟雾”导致了四千多人死亡，就像特殊的自然环境、工作环境会导致疾患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生态（毛有意制造的“天下大乱”，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的局面）导致了普遍的执政能力低下。这是政治性的不可抗力。

对于聂与校文革来说，其执政能力低下还有特殊的原因——最初是因为思想保守，不够激进，被江青批评。后来是因为揭露检举了王关，得罪了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持续公开地打压聂与校文革，北大校内外的反聂派势力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可以想象，在陈伯达指斥聂元梓“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权”，在井冈山的喇叭整天高喊“聂破鞋”的时候，还有谁会听聂元梓和校文革的话？聂的威信还有几分？概言之，在愈演愈烈的内外夹攻之下，聂的执政能力不低下才是咄咄怪事。

按理说，这种因政治生态造成的执政能力低下，应该由政治生态的制造者埋单，而事实上，基层领导如聂元梓者，却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文革后，中共以政代法，宣判聂的三大罪状。遭到法律界的正义之士的有力批驳——原最高检察院干部谢甲林针对《刑事判决书》“文革初期，在聂元梓篡夺北大领导权”的说法，批驳道：第一，1966年6月初，“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一切权利归工作组。是工作组掌管了北大的党政大权。因此，称聂元梓篡夺北大的领导权，纯属诬陷。”第二，是年9月11日，在中央文革副主任王任重的指导下，北大经民主选举产生了校文革，聂任主任。“既非篡夺北大的领导权，又非篡夺工作组的领导权。”针对判决书“在聂元梓篡夺北大领导权期间，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200多人被诬陷为黑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说法，谢甲林质问道：“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北大工作组进校后，从1966年6月1日到6月26日不到一个月，全校各级干部、教师等被批斗的达230人。工作组撤走后，一直由各系各单位群众自己管理，批斗。校文革66年9月成立后，也没有接收。直到68年3.25发生武斗时，为了这些人的安全，才由校文革集中管理。群众称为‘监改大院’，或称‘黑帮大院’。”（谢甲林：谈聂元梓案的几大疑问，聂元梓，2017，956）

在回忆录中，聂元梓对判决书的上述说法，也做了强有力的驳斥：

“北大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200多人被谁诬陷为黑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判决书没有写清楚。……除陆平、彭珮云（大字报点名）外，任何一个人我也没有说他是‘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更没有给做结论。这是毛主席以北大为‘典型’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特别是‘六一’广播大字报后，出现的群众运动情况。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来北大讲话，动员群众起来反对‘陆平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这样造成的后果，怎么能归罪于我个人诬陷、迫害呢？”（聂遗稿，2021，358-359）

“这些被群众冲击的干部（包括陆平、彭珮云）、教授、讲师在工作组时期已经集中监禁，被群众称为‘黑帮大院’‘监改大院’。并出现打人骂人的严重违反政策的情况。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不就是这样死了吗？校文革成立后，（1966年9月12日成立），这些被监管的人员，经王任重批准，从工作组接收过来（工作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大约八月中旬停止工作的，月底前离校。这批人是海军工作组负责管理的。）并不是1968年5月，在我主持下才成立的。

五月之前，难道这些人都在家里而没有被监管吗？难道他们没有被称为‘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吗？程贤策为什么那个时候死了？为什么在校文革管理的时候没有死人？”“后来，是否有学生（个别的）同干部、教授等人关在一起，我不清楚。没有人请示我。我也没有指示任何人去抓人。关于陆平等干部、教授、讲师被集中管理劳动，应如何办？我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没有指示。……自然我不敢随便处理和放人。”（同上，359）

“判决书写被诬陷的干部、师生所受到的人身迫害，没有说明是谁搞的人身迫害。是我指示搞的吗？不是。法庭调查是知道的，但为什么还是笼统地写在我名下呢？搞人身迫害，我是反对的，校文革常委多数人也是反对的。当时，我多次讲过，不准打人骂人，指了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为此，我专派两位校文革副主任负责，孙蓬一分工负责，实际上是三个副主任负责，仍发生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只有谁搞的谁负刑事责任了。”（同上，360）

时至今日，无论是谢甲林的质疑还是聂元梓的驳斥，中共的法庭都无法面对。中共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制造了新的冤假错案。

聂元梓能像季羨林以为的那样“为所欲为”吗？答案是否定的。“天下大乱”的政治生态注定了聂元梓不能“为所欲为”。同理，在中央上层和内外反对派的多重压力之下，她也没有“骄横恣纵”的资本和空间。

那么，为什么她会给北大人造成“为所欲为、骄横恣纵”的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人们高估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执政能力。以为聂元梓像陆平一样，掌握着北大的党政大权。第二是人们把北大的乱局、中央领导指示的事（如周恩来下令抓杨勋、中央文革指示砸校刊是反革命行为，下令抓有关人等），系文革和公社做的事，如逼死沈达力，公社武斗队打死三名学生、抄季羨林的家等，都记到了聂元梓的账上。事实上，黑帮、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名单由系文革掌握，反聂派（如井冈山）的名单由公社各团认定，如何处置这些人，也由系文革和红X团决定。抄季羨林的家，是东语系红九团的事，九团的这一行动不会请示聂和校文革。第三是人们脱离历史语境，把聂和校文革执行《公安六条》对北大异端和反对派进行的惩罚都视为聂元梓的“倒行逆施”。

一位亲历文革的北大教授这样评价季羨林：“季羨林是泄私愤，其实聂元梓

并没有害过他。他被抄家、挨批斗、进‘牛棚’都是东语系红九团干的，聂并不知道，更没有指示过。季羨林是把他在文革中受的苦遭的难都记到聂元梓的账上了。要骂人不是捡最极端的语言来骂吗，管它符不符合事实。至于季羨林是不是哗众取宠，是不是自诩高明就不好猜测了。看了他写的《牛棚杂记》我觉得有失他教授、大师、副校长的身份。不管他够不够‘国学大师’的资格。人们都是拿这样的眼光看他的。一位大师写这样的书，眼光太浅，缺乏对社会现象的洞察力，有失他‘身份’。不过，这倒是他的真实的面貌。”（2022-3-30 访谈）

【序跋】

黑与红

——断层年代的白描叙事跋与后记

甄皓⁴⁹

跋

伟大领袖去世仅一个月后，以伟大领袖的夫人为首的坚持文革路线的“四人帮”即被一场不流血政变清理出政坛，这次“外科手术式打击”不是来自境外早先的老大哥即当下的新仇敌苏修，而是来自伟大领袖的身边人：他自己选定的新接班人，尚未被打倒的军队老师，以及中南海大内总管。在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欢天喜地上街游行庆祝这一波前景未卜的变化，如同一次盛大的节日。在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街头揭批“王张江姚”的大字报和漫画铺天盖地，吸引着如潮的人流驻足观看和议论，在伟大领袖生前常住的宾馆门前，甚至乘乱出现了质疑伟大领袖的性生活如同封建帝王的大字报，但很快就被覆盖了。伟大领袖的遗体被取出五脏六腑填入福尔马林棉花做成栩栩如生的现代木乃伊，陈列在京城大十字中央的宫殿里，供他在世时教化出来的好几亿依旧崇拜他的子民们膜拜瞻仰。新的伟大领袖被称为“英明领袖”，但没几年即被党内有老部属拥戴更有智慧更有能力的实力派挤出权力圈。犹如个人的世界观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发生嬗变一样，新中国像一个充满理想内外树敌的热血愤青，在经历了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疟疾，狠狠地撞了一次南墙走投无路之后，终于回头步入了比较务实的

⁴⁹ 甄皓，1947年生，非常规的平民码字者，75岁前后写下唯一的一本书《黑与红》。年轻时当过工人，科技干部，国际贸易商人，退休后成为背包客游走天下，自号“领过ROC身份证的PRC驴友”。

中年。

那些在文革中靠造反混得一官半职的，在刚听到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时，一个个都面如死灰，神情恍惚，连连唉声叹气：“想不到！真的想不到！”他们虽然经历了文革的大风大浪，但是对党内历史上的多次“路线斗争”只有从报纸上得到的知识，没有想到上层的斗争会采用这样的形式和手段。他们都预感自己飞黄腾达的远景就此打上了休止符，不过，在许多企业类的单位中，靠造反提拔上去的干部假如在文革中没有犯大恶，几乎都是在四人帮倒台后十年左右才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浪潮中被逐步淘汰的。

从1977年到1978年，全国所有几十万（据说原定正式右派为五十五万，有官方资料说加上各种边缘分子实际有一百多万至两百万）自1957年“长期以来认罪服罪态度较差”不予摘帽的“右派分子”，一夜之间“在广大群众的批判教育下，能认罪服罪，老实改造，有一定的悔罪表现”，被“根据群众意见并按照党的政策”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之后的1979年，又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的精神，宣布全国的右派分子除了六名知名“中央级”人物典型和其他各省96名有特殊原因者外，全部系“扩大化”造成的“错划”，予以“改正”。但是“改正”的恩惠并不是免费的，需要右派分子们以个人名义填报改正申请书，申明自己从二十多年前到现在一直是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根本并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压抑和苦难（许多人已经死于非命），广大右派群体急不可待要获得彻底解脱，纷纷喜滋滋地填写了申请书，表白自己本来就是忠于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民一分子。这样，党依然伟大光荣正确，右派们也得到了晚年的幸福安宁，可谓两全其美。

1979年年初，中共中央发文宣布给全国的地主富农和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帽，其中地主富农的人数根据77年底统计“尚存”的是467.2万人（土改前后中央文件的统计数据是三千多万人，不包括子女），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尚存”人数是145万人（总数则是模糊不清的国家机密），由此可知“四类分子”加上其家属子女曾经是何等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文件特别澄清了地主富农的子女和孙辈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和待遇问题，从反面证明过去许多地方的政策概念是一锅糊涂粥。

1979年，在云南农场知青首先发难要求返回城市，经历了游行，下跪，割

腕，上京请愿等种种抗争后，终于使党中央改变了态度开放了大返城的闸门，全国一千七百万城市知青几乎全部通过五花八门各显神通自欺欺人的“病退”手续返回了他们原来居住的城市。这种方式的含义是：党领导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所有的知青都“生病”了，无法继续在农村务农，需要回城休养。和“右派改正”一样，党依然伟大光荣正确，知青们也满足了回城的愿望，也是两全其美。

由于和小昊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同窗，且经历相似心境相通，我在小昊去西北后一直和他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他每次回来探亲都会和我碰头，因偶然机会我还结识了早几年和他同住一个工棚的小庄和小霍。小霍有次和我说，小昊真是怪人，他爸爸摘帽不是好事么，变成人民内部矛盾了，我观察了半天他一点没反应。后来又改正了，那不更是大喜事么，完全回到人民群众队伍里来了，我看他还是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精神状态还是不知不觉，真怪！我拿小霍的话去问小昊，他一脸不屑淡淡地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不过是听天由命罢了，即便上面继续不摘帽不“改正”二十年，我们又怎么样？还不是得老老实实地活下去？不过他告诉了我一段“改正”在渭原厂里执行“消除影响”的过程：人事科的一个退伍军人老干部把小昊叫到办公室，在桌面上打开了那个神秘的要跟随自己一辈子但自己一般永远看不到的“个人档案袋”，他先宣读了小昊父亲所在大学给渭原工厂发来的关于“消除影响”的通知，然后从档案袋中抽出一叠材料，说是文革时期的，包括小昊刚进厂时烤漆分厂革委会和造反派去父亲单位外调父子两人政治面貌思想状况的记录，但并没有让小昊过目的意思，说是由组织上负责销毁；而文革之前的材料，包括小昊读初中和高中时学校人事科去父亲单位调查父亲政治面貌时抄录的父母档案，则不在销毁之列。老干部戴上老花镜拿了一支蘸了墨汁的毛笔，把档案袋中各种个人简历表和所有其他不拟销毁的材料一页一页逐行扫视，凡有“右派分子”四个字的一律用墨笔涂去，并不管上下文如何，这样前后一共画了十几道墨杠杠，小昊乘他专心画杠，瞟了一眼那堆要销毁材料，发现面上一张居然是自己在文革初期贴出的大字报的抄录稿，标题是《对当前我校运动的几点看法》，不但抄录了当年近十张白报纸的原文，而且连当时大字报边上的空白处其他人添加的小字（俗称“戳一枪”）不论是讽刺谩骂还是赞赏，统统照录不误抄写下来，令小昊倒吸一口冷气，暗想当年究竟是谁抱着怎

样的心态要求抄录这份大字报并把它塞进自己的个人档案袋的，难道这个人看出来以为不论形势如何变化，这种对一个人一生的思想进行监控的记录始终是“有用”的参考资料吗？最后，那个人事老干部把要销毁的文件扔进一个破搪瓷脸盆用打火机点着，又从中抽回一张桃红色的厚纸递给小昊说，这个你可以拿回去自行处理，小昊一看却是当年毕业分配时发的“忠心书”，上面印着人们熟悉的那个伟大领袖四分之三侧面的头像，下面是自己十多年前填写的志愿和誓言：“到黑龙江农垦农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猎猎火光在眼前扑闪，文革历史在火光后面化为灰烬，各种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听小昊对我讲了这段戏剧化的经历后不久我又见到了小庄，他倒是告诉我了一段小昊自己没有提及的事，在“改正”早已尘埃落定之后一个多月的某个傍晚，小昊突然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大哭了一场，哭得简直是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像野兽般地嚎了近二十分钟，把住在隔壁的邻居和楼上的北京知青吓了一跳，不明白这个平时沉稳内敛的小伙子为什么突然会这样鬼哭狼嚎，他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都来敲门发问，但就是敲不开。同室的小黄下了中班回到宿舍，见小昊已经在床上昏昏入睡，地上有一张折皱的信纸，捡起一看是小昊的弟弟写来的，内中说他过五关斩六将，给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送了最后一轮的礼，包括肥皂白糖灯泡等紧俏物资，终于把病退手续办好快要回城了，特地向哥哥报个信。信中提到自己一个月前收到的父亲发来的五个字的电报喜讯“改正获批准”，又回顾了一下他这近十年在农村的艰苦历程，讲到某次收工后到山上去挑柴，穿草鞋的脚不慎踩上了陈年的老竹茬，脚掌被刺穿流血不止，人也痛得昏了过去，要不是被路过的老农发现救下山，差点丢了一条性命……，看来这样的经历在小昊弟弟早期充满革命信念的信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说明他弟弟的观念也在经历某种嬗变……也许就是这封信的内容，刺穿了小昊内心深处的要害——整整二十二年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彷徨！我们的爱情！不管是红是黑，就这样被归零了！现在，一切的一切，要重新开始了！

历史的长河继续滚滚向前，接下来是宽松活跃弃旧图新充满希望的80年代初，再后来是高层在改革中的左右互搏，再后来是在价格双轨制，官倒腐败，通胀失控，全民经商的一片乱象中以悼念改革派领袖胡耀邦为名爆发的八九民主运动。当六月四日清晨电台已经广播过“首都昨晚发生反革命暴乱”（俨然又重演

了一次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观念和对策),宣布北京的动乱已被坦克镇压下去后,南方的一些城市仍处于半瘫痪状态:在杭州,两个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就能挥舞小旗在京杭运河大关桥交通要道口命令所有的货运车辆停驶,造成大片交通积压,司机们都乖乖地听从这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学生的指挥,似乎学生的背后仍有着牵动国运的神秘力量,直到两天后形势完全明朗,司机们才恢复上路前行。之后的90年代,政治管制进一步收紧,“生活上”却一路放开:广州小北铁路立交桥下的麓景路两侧,一到晚上就有众多穿着白色粉红色半透明纱裙的年轻女子气势张扬地站在路灯下一字排开或双手叉腰或搔首弄姿,等待男客的挑选。一个穿黑色连衣裙有几分大学生模样的女孩经过几秒钟的目光对视后主动和我搭讪,成了我的私人导游,她主动给我看了姓名史南萍地址哈尔滨道里区的身份证让我打消疑虑,然后带我闯进路边登峰大酒店二楼的一间大厅,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定神一看才感觉到对面有大约二三十双猫一般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静悄悄地注视着你,小史哈哈大笑拉着我的手逃出大厅,告诉我那是等待挑选的卡拉OK陪唱女,然后又陪我继续去见识附近的迪斯科舞厅,点歌酒吧,通宵影院情侣座之类的“新生事物”……,午夜时分我们爬上立交桥,沿着脚下延伸消失在远处黑暗里的铁轨慢慢地散步聊天,小史这时坦承自己其实是内蒙包钢人,因社会动荡家庭失和她一个人南漂流浪到广州和深圳,那张身份证除了姓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我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小史当作一个倾诉对象,说我们父母那一辈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地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无数次运动,好不容易才把自己改造成艰苦朴素类似工农的“一代新人”了,现在突然发现社会又回到了比“解放前”还要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状态,不知做何感想……黑暗中的小史有点茫然地注视着我,不太懂我在感叹什么。

我已经不再做在天空行走的梦,也不再指望和周围的人群敞开心扉做人生的探讨,而这个世界依旧像当年从空中看到的地面,杂色斑驳,隐晦多变。新一代人未必会完全领悟和继承上一代人经历千辛万苦得到的认知和体验,但我辈人仍不断地在充满断层的年代中艰难跋涉探寻人生的真理,它在前面指引着我们人生的方向,尽管它始终在不可触及的远方。📍

后 记

我们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

1948年6月，国民党政权已临近风雨飘摇败象毕露的日子，却还在一本正经地“实行宪政”，要给全国老百姓颁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那时的规定也和大陆1984年才开始实行的“居民身份证”一样是“十六岁以上必领，十六岁以下可由有监护人代领”。我父亲当时肯定是出于“留此为证”的戏谑心理，帮我也办了一份，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张用印钞纸印制的身份证的样子，上面有我一周岁的照片，注有“XX区XX保XX甲”的字样，周围有一版一百多枚购物证小票（Coupon），大约是用来供应配给米或其他物资用以限制“匪谍”活动的。但是这样的印刷品纸片片如在文革抄家中被发现肯定会被当作怀念旧社会的“变天账”罪证，因此被及时撕成碎片冲进下水道了。看来我们这一代人，要经历“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经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自知记事较早，因为1950年前后国民党军机从舟山岛骚扰轰炸大陆沿海城市时，家里窗玻璃上贴满白色交叉纸条，探照灯在夜空中四处摇曳，听到警报声全家人熄灯躲进一个充当防空洞的小储藏室的情景，在我脑海中都有很深的印象。那时夜间做噩梦发现妖怪爬到我窗口，那妖怪的形象竟然是穿条纹裤和燕尾服，头戴高礼帽下巴蓄着一撮山羊胡子的外国人，不用说那是当时政治漫画中由“山姆大叔”演化为“凶恶美帝”的标准形象。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半叶，我的小学的附近有一家少年儿童阅览室，小学三四年级时课余经常到那里去看书，办了借书证就可以在阅览室里借阅各种图书，而多数人基本上是只看连环画，那是用四五本连环画装订在一起的一厚本，看完一本再去换第二本。五十年代中期的连环画比较有品位，不但绘画有很好的美术水准，而且取材大多是世界文学名著，我一个小学生就沉迷在那些“小人书”里，现在还有印象的连环画书名有莫里哀的《吝啬鬼》，契科夫的《跳来跳去的女人》，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莫泊桑的《项链》《苡威迪》，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警察和赞美诗》，电影连环画《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还有一本水墨画的《人与狼》，记得是讲意大利两家山村猎户之间的爱恨情仇，穿插了人性和狼性的描述对比，印象很深，可惜现在网上已经查不到这本小说原

作和作者的相关信息了。人到晚年回忆起来，我最初的文学启蒙人文启蒙竟然是靠看这些“小人书”完成的，很有点“师出无门”的羞愧感觉。

小学四年级时我在那个阅览室看了一本连环画《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方面深深地为其故事吸引，一方面又觉得我自己也能写一本差不多的书，于是在一本大方格作文本上开始了野心勃勃的创作，记得开头大约是这样写的：“一个温暖的春天下午，老航海家史密斯正坐在屋里窗旁喝咖啡，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他的好朋友彼得，彼得兴冲冲地说，我最近有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到南极去航海探险，史密斯很高兴地说，好啊，我也正有这样的打算呢，于是他们两人……”可惜的是我在作文本上写到第五页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儿时雄心勃勃的写作梦就此早早夭折，虽然到了小学五年级，我的一篇文章罕见地得到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好评，但那次好评并没有再次激起我对写作的向往。那篇作文写的是参观农业展览会的观后感，讲到我看到一台为竹编制作原料的劈竹篾的机器，能麻利地把竹子劈成细条，我在结尾写道：“而我看到的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污蔑，随着这台劈蔑机的轰轰作响，被劈得粉碎了。”班主任老太太用蘸红墨水的钢笔在作文本上写了长达半页的好评，说是“……有事实有评论，用亲身经历批驳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谰言，好！好！！好!!!”老太太写得很激动，在最后一个好字后面溅落了一大滴红墨水。但是我知道，这个好评与作文写得好坏关系不大，关键的是那时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要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否则就有麻烦。其实“右倾机会主义”对一个小孩来说完全是个莫名其妙的词汇，就像“油琴鸡烩主意”差不多。

到了退休后多年，当生活逐渐安定，为稻粱谋的奔波已经停歇后，人生中最动荡又是最有思想的青年时代所积压下来的思绪，忽然又涌上心头，形成了强烈的自我表达的热望。经过前后几年断断续续的手书草稿和敲击键盘，已在电脑里存下了一些零散的“码字练习”，有赖2020年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提供闭门不出的大段时间，终于把这些零散作文集结成了这本“四不像”的东西。自认没有文学天赋，缺乏专业训练，学养浅薄，但相信每个人的记忆都有独特的价值，又相信自我表达是天赋人权，所以还是认认真真地爬完格子并不揣冒昧把它公之于众。章诒和先生说过：“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

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受这段话的鼓舞，希望自己的这本小书，也能成为共同历史记忆中的一砖一瓦，它是对自己青年时代的真诚纪念，也是留给我们的后辈探寻前辈心路历程的参考。

父母一辈人的 Highlight 是他们的青年时期，那时正逢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意气风发地高唱“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洪波曲》，田汉词，张曙曲），用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热诚和贡献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历史。而我们这一代人的 Highlight，很可惜只能是中国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被党的领导层定义为“十年浩劫”和“十年动乱”，近年又被改称为“艰辛探索”，成为党的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预料今后对其性质定义还会有或明或暗的反复争论和长期拉锯战），这十年的社会动荡恰逢我们的青年时代，正是观察社会，形成世界观的时期。那是一个集中暴露各种社会矛盾的断层年代，它和之前之后的年代大不相同，又和之前之后的年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那是一个暴力肮脏愚昧封闭令人窒息的年代，但其中也镶嵌着一些纯真的理想主义，也包含着一些清醒的勇敢的反抗，它也教会了我们许多在平常年代体验不到的东西。

我们是从小就接受洗脑式教育的一代，心灵深处的某些扭曲难以完全平复，眼界和格局都会受到过去时代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客观地正确地叙述自己所处的年代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噩梦中走出来的亲历者，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对那个世界有比一般人更清醒的认知。从“存在即是合理”的哲学角度，无论怎样的个人表达自有它的历史意义，所以自己还是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包括自己的惰性）写下了这篇真实年代虚构人事的“叙事”，说是“虚构”，却大都是“事出有因”，也有历史轨迹可寻——1968年某月某日在某路口抛锚的中型吉普车上的大学生青年若还健在，能看到本书第18章，必然知道那写的就是他们自己。但个人际遇只是一滴水珠，无数的水珠汇成了真实历史的浩瀚大海，具体个人的对号入座已经没有意义。所以对于文中的“真”和“假”，还是那句老话“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来假亦真”，读者自可凭各人的经历智慧良知去体会。

文革中的语境既封闭保守畸形又随着政治风云瞬息变幻，这些都力求在写作

中得到体现。文中的叙事，有的展现的是当年的思维方式和语境，有的体现了数年后后的反思，有的则已经包含了数十年后互联网跨越高墙后得到的新资讯新视角和新认识，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视角不同心境的叙事有时交错地排列在一起，但绝不应该不分时空不分历史环境混为一谈。《颠倒岁月》（2012年出版）一书的作者徐小棣在后记中说“以近年来的认识和心境去还原几十年前的场景，想必难免存在重构和偏差”，说得完全在理，在观念和语境已经变化的今天，作者已尽最大努力去避免对基本史实的“重构和偏差”，相信聪明的读者，尤其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读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分辨体会文中的时代落差，在此先谢谢因彼此缘分读到本书的读者。

文革从本质上来讲是“山寨内讧，祸国殃民”，当林彪事件爆发，文革的荒谬已经一览无遗时，我曾经预想将来会有千百部如同《战争与和平》一般的史诗巨著来回顾解析这个风云跌宕充满戏剧化政治斗争的时代，这个充满民族惨痛教训的荒唐耻辱的时代，但是，由于上层眼前的政治需要，结果竟然几乎没有。有些作品用图案化，寓言化的风格来写文革，无法触及其本质，其效果和全景油画或大型交响诗般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法相比，终究显得大题小做，隔靴搔痒。文学批评家们所说的“把缺失当作强项，奉行躲避崇高策略，鄙视宏大叙事，消解终极追问”成为文学和出版的主流。在这样的环境中，更觉得文革长篇小说《迷冬》（三部曲之一）等少量作品的可贵，也和作为同代人的《迷冬》作者胡发云先生痛心于反思文革的文学作品如此萧疏有强烈的共鸣。

平民百姓，写作不易，寻求出版更难，神州大陆自不必说，向海峡对岸十几家出版社寻求机会包括自费出版，也基本上全无回应，不得已只能先从亚马逊KDP网络自助出版寻找突破。在困顿过程中，曾有幸得到胡发云先生的鼓励和指教，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发现美国华忆出版社并出版这本书，绝对是一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体验。当历尽挫折自己对出书几乎已不抱希望时，却在Youtube平台的一则视频中偶然发现了美国华忆出版社的名字，去网上一搜，意外地发觉她的宗旨和出版方向正是自己孜孜以求的。3月15日将文稿发电邮去征询，次日即收到“可以出版”的肯定答复。有赖编辑乔晞华先生的学术修养，专业精神和耐心细致地与我沟通，这本书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校对排

版，终于在大洋彼岸获得了“出生证”（ISBN）顺利出版付印。

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正值俄乌战争炮声隆隆硝烟滚滚，而国际大都市上海正经历封城抗疫的空前沉寂，历史的巨人正用怜悯的目光，俯视着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和命运再次被推入荒谬的困境并经历惨烈的考验，一如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断层年代”。📖

【述往】

六年芝麻官（三）

——一个县委书记的实践与感悟

李 辅

十五、钱该往哪儿花？

襄汾是个富县，日子比较好过。县里有一个好管家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吴克敏同志，开源节流，精打细算，1973年底财政结余还有34万元，到了1974年底财政结余达到了50万元。县里有钱该往哪儿花？县委常委讨论决定修县委办公大楼。县委机关还是五十年代两县合并搬迁到史村时建的几排土木结构平房，已经20年了，老旧残破，已难满足办公需求。就在原来大院，拆除了最前面的一排，建设一座四层楼房。这是襄汾县城第一座楼房，我曾欣喜，这是历史第一。接着在体育场又建设了一个有看台、可坐三千观众的灯光篮球场。当时并未觉得不妥。

若干年后，社会上有一句响亮的口号：“穷什么都不能穷教育：穷谁都不能穷孩子”，惊醒了我。回忆1973年我到关村下乡，工作队告我，村里学校占用旧庙，冬天没钱买煤生火，买不起糊窗户纸，冻的学生在户外太阳地上课，老师用石灰在黑板上写字，我曾严厉批评过关村的干部，指责他们不关心学校。

还有一个场景，记忆犹新，难以忘却，那是1975年秋，地区教育局大大邓学校召开现场会县教育局李局长李仰喜让我参加。那几天正下着大雨，车开到贾庄陷进泥泞中，怎么也爬不出来，后来请贾庄公社帮忙调来履带拖拉机，才把吉普车拽了出来。到了大邓学校，参加现场会的人已经离去，县教育局的同志领我参观

教室，原来这个学校创造了用砖块和水泥板制作课桌课椅，整齐好看，坚固耐用，节省开支，要在全区乡村推广。那时，我心里想这硬邦邦、冷冰冰的桌椅，学生坐在那里多么难受，我没表示太多的支持。可是也没想到县里出资解决全县学校的困难。好像教育与县政府没有关系，是上边和下边该管的事。

文革期间批判教育黑线，废除高考制度，教育好坏对县官没有压力。其实这是严重的错误和失职。发达国家法律规定教育经费不少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服务型的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办好教育。我当县官的时候，就缺乏这种观念和意识。岂止是我，直到温家宝那时，整个中国才把实现“百分之四”，作为奋斗目标。“不能穷孩子、不能穷教育”喊得响亮！

十六、违背民心的事决不干

1976年元旦过后不久，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周总理在我的心目中非常高大，我十分崇敬。虽然早就知道总理患不治之症，但突然离世，从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在北京参加中办学习班时，我直接听过总理的讲话，总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对人平等尊重，对晚辈青年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特别是在文革中，在全国大乱中，周总理夜以继日，日理万机，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千方百计稳定全国形势，真是耗尽心血，做到了鞠躬尽瘁。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失去了总理，就像地陷一般。谁都知道文革十年，是总理苦苦支撑着这个灾难的国家。

为表达对总理的痛悼之情，我急忙从南高一回到机关，部署悼念总理的事宜。决定在县大礼堂设灵堂，全县人民悼念三天。全县机关干部正在忙着上山折柏枝，做花圈，写挽联，筹备悼念活动之际，以中央的名义下发禁令，不让基层百姓进行追悼活动，不准设灵堂，不准组织群众追悼，禁令是发了一次，再来一次，连发了三次。

当时不知内因，不理解中央的通知，也不能听中央的禁令，一级党委应该按照人民的意愿，追悼总理。不能干不得人心的勾当。我们县委常委轮流在灵堂守候，和广大群众共同怀念总理的丰功伟绩，共同表达悲痛敬仰之情。

当1月15日在电视中我们看到北京十里长街百万民众自发挥泪送别周总理悲壮场面时，更激起我对总理的热爱和尊敬的深厚感情。

党中央下禁令阻止全国人民自觉自发悼念周总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心中埋下了未解的疑团。之后，各种传说纷起，报纸电台开始批判右倾翻案风，政局扑朔迷离。怀念周总理的活动，风涌浪起，到了4月5日，发生了天安门广场镇压群众事件。

1976年初，我老伴决定离开太原，调到襄汾工作。三月份办理调动手续后，月末，领岳母并带上我三岁的儿子到北京去探亲旅游。4月4日晚，她们正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宏大场面。也听到了吴德劝说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严厉的讲话。人们的气愤和不满已经沸腾，北京当局担心事态失控，准备镇压，终于在当天晚上发生了流血事件。当局动用了数万人组成的棒棒队驱散了广场上悼念总理的群众，广场上留下了人民的鲜血。第二天，我老伴再去天安门广场，看到许多人用高压水龙头冲洗天安门广场的血迹，企图洗刷他们镇压人民的罪行。

党中央发布了由毛主席批准的通告，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总后台，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此之前，事实上早就开始批判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已经不再主持国务院工作了。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我当时并不相信。对悼念周总理活动的镇压，充分说明了一些人反对周总理，他们不得人心，与全国广大人民站到了对立面。

我老伴看到天安门的血腥镇压，当她到了当襄汾，向我介绍了她目睹天安门广场镇压的实况，我更加明白了，原来中央宣传的全是欺骗人民的舆论。紧接着中央部署“追反追谣”运动，把参与“四五运动”的人作为反革命要进行追查。把悼念周总理时写的诗歌，反对镇压“四五运动”发表的言论，都作为反革命谣言进行追查。临汾地委的头头很积极，很卖劲，还创造了许多方法，比如一查到底，直到追查到最初制造谣言的人，说不出传谣的人，就要自己负责。地区还逮捕了几个“反革命”。我对地委的这些做法不满，并进行抵制。告给追反追谣办公室的同志，不要轻易汇报什么谣言。比如有一个大队在打麦场小房的墙上写了一首怀念周总理、反对镇压“四五运动”的诗，一看就知道是传抄的，我告赵占华同志不要汇报。襄汾“追反追谣”没有搞过一个人，就是把人所周知的社会上一般传说的东西汇报给上级，消极抵制，走了走过场。

邓小平被重新打倒以后，中央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作为一个县委

书记，处于十分矛盾和尴尬的地位。说邓小平是制造“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明知不是事实。批判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提出的“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第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胡耀邦同志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都作为邓小平的黑纲领进行批判，觉得牵强附会。12号文件说得有道理，无法批判。反过来，作为拥护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对于邓小平把一切动乱的原因都归罪到造反派，对造反派不分有罪无罪，是否干过坏事，而一概指责和打击的做法，极为不满。思想上确实认为邓小平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为了稳定襄汾形势，我利用一切政治口号，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稳定。为了贯彻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解决“五种人”掌权问题，我用“继续革命理论”阐述“五种人”掌权，狠批“走资派”，而且把“民主革命派”“老好人”也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进行批判。采用的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确实说过错话，做过借事。

当时，我没有怀疑过毛主席，没有怀疑过党中央。盲人骑瞎马，一个县官犯错误是正常的，不犯错误是不正常的了。但是，昧良心的事决不干，违背民心的事决不干！

最近几年，网上披露国外出版的《杨尚昆日记》，记载杨尚昆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就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的。”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通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

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胡耀邦还告诉杨尚昆“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我问，为啥杀人灭口？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

天呐！不知这些事情真假？至今也未见有人出来辟谣。若是真的，那1976年毛泽东处理邓小平就一点也不冤！而且，证明邓小平是个地道的阴谋家，十恶不赦的刽子手。政坛真的黑暗莫测，只能等待将来揭开黑幕，露出真相！

善良的人啊，真是被骗没商量！

十七、三大工程与农建兵团

1976年，襄汾小麦生产大丰收，棉花也是一片丰收景象，群众不管你上边谁斗谁，谁掌权，只要他们得到经济实惠，能解决温饱，就心满意足了。

县委在二年来的生产实践中，为老百姓谋了利益，群众十分支持县委的工作。

1976年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打通了赵康通往永固，南贾通往永固，贾罕通往湖里三条公路干线。土地平整，改造低产田动工面积大，要求标准高，很有声势，地区认为干得好，专门在襄汾召开现场会。棉花生产，全省组织专管干部、科研人负来襄汾参观。吴吉昌劳模也赞不绝口，夸奖襄汾棉花生产搞得好。

二是麦收后，全县动员两万人，开挖七一渠，搞延线工程，全长16.4公里，这是一项富民工程，把七一渠的水直送到七一水库，可扩大十多万亩水地。七一渠受益区全部在河西，但是这项工程动员了全县21个公社的劳力，河东的九个公社都不讲条件，自带粮食，自带工具，不计报酬投入挖渠工程。这说明当时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也说明县委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这项襄汾县有史以来动员人数最多、开挖土方最多的富民工程，这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如今不仅灌溉着几十万亩粮田，而且为侯马市提供工业用水和饮用水。

三是化肥厂的改扩建工程，米庆录同志到县化肥厂工作后，发现影响化肥厂增产的卡脖子项目是造气不足，需要增加一个气柜，投资八万元。县委决定发动全县干部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支援化肥厂。我和老伴要拿出九十元，这要影响我家

庭的正常生活，怎么办呢？我决定戒烟，戒烟后一年可节省下八十多元，这样就可以度过困难。全县集资了五万多元，购置和加工设备，其余土方工程，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举全县之力，顺利完成了工程，使化肥产量猛增。干部带头是完成任务、战胜困难的关键。

这三项工程的胜利，充分说明襄汾全县上下一条心，干群一股劲。俗话说，三人一心，黄土变金。襄汾的实践充分证明干群团结的巨大力量。现在看，七一渠的工程搞了平调，刮了共产风。非受益地区出工不受益，未得到补偿，是我的错误。这种错误当时并不认识，还觉得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认识到侵害了群众利益。

为七一渠延长，七一水库扩容，县里组建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兵团，人数最多时达到三千人。这支专业队伍，能打硬仗，经过八年奋战，完成架桥、修渠、渡槽、加坝固坝系列工程，为襄汾水利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在襄汾的大地上树起了历史的丰碑。八年的磨炼，这支队伍磨炼了意志、开阔了眼见、学到了本领、掌握了技术、结交了战友，培养了一批人才。

三十多年过去了，有许多战友年过花甲，功成名就，已经退休，还有一批活跃各条战线，继续创业致富，但是，八年奋斗结下的友谊终生难忘。近几年通讯事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互相联系的条件，在李玉英、李红喜、卢翠萍的组织下，建立了兵团战友群。去年以来，已经组织了三次规模渐大的战友聚会，有的从广州、北京、西安等地专程回乡，老战友重逢，格外高兴，又唱又跳，说不完的往事，道不尽的友谊，远在海南、上海的战友不能还乡，连线视频，表达心意，分享欢乐。他们欢聚的时候，还记着老书记创建兵团，要“感恩致谢”非要见见我，让我视频讲话。农建兵团那时“住的土窑洞，吃的窝窝头”，受的苦中苦，几十年后从苦中尝甜，痛中寻乐，精神令我赞叹！那时，群众是真的，领导是真的，干群的感情也是真的，没有一点铜臭！

今年春节聚会后，兵团战士曹洁写给我的短信说：“到会的人当中，有不少人记得‘农建兵团’成立时间：1975年12月5日，清楚地记得当年在‘襄汾县农业建设兵团成立誓师大会’上，你激动人心，催人奋进的讲话；大家满怀深情地回忆你对兵团战士寄予殷切希望和热情洋溢的鼓励！”曹洁最后又补写说：“李书记：有襄汾人民的如此爱戴，你过去，现在，将来都应该知足了！”知足常乐，

常乐长寿。我活在人民的赞誉中，金钱难买，倍感幸福！

十八、多事之秋

1976年的盛夏7月6日，朱德逝世，国人痛心。因已九十高寿，多年淡出政坛，没有引起全国震惊。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夺取25万人的生命，全国恐怖！惊魂未定，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时许多人认为，天塌了，惊慌失措，该如何应对。

唐山大地震后，我安排完抗灾防灾后，于八月中旬，按早先的计划，带领常委和公社书记三十多人去河南林县参观，学习“红旗渠精神”，到河南辉县学习发展社队工业和建设大寨县的经验。当时，我千方百计想做好工作。真想干，想真干，想到省外先进地区学真经。林县在杨贵书记带领下是以愚公移山、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天辟地修建了世界奇迹红旗渠，引来太行水，林县翻了身。辉县在郑永和书记的带领下，改土造田，整修十六万亩土地，新造了两万五千亩良田。辉县地边的石坝全部过了鳖，整整齐齐，叹为观止。参观社队企业，主要看他们将麦秆造纸，再制作包装箱的过程。

杨贵和郑永和都是实干家，有胆有识，有战略眼光，当一个县委书记抓住了改变该县面貌的关键，有雄图大略，有周到的举措，以身作则吃苦在前，能把全县干部组织带动起来，既有事业心，又有领导艺术。这两位书记，是一本读不够、读不完的书。认真学一辈子，会有收获，但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

参观了林县、辉县，襄汾社队企业首先有了新的发展。

十九、历史开始大转折

九月九日地委开会上午研究“批邓”，临散会时，布置下午有专人辅导批判邓小平的“三个黑纲领”。本来所谓的黑纲领没什么错误，不好批判，硬是要“歪批三国”，我心里有抵触情绪。会上我说，赵书记，大批判还要辅导？天这么早，小麦种不下去，心急如焚，可不可以请假，回去抓抗旱种麦？赵书记说，谁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我说：“好的，下午我就回县里了！”

刚刚回到襄汾不久，地委又通知召开紧急会议，又快速赶到临汾。下午开会，气氛很严肃、凝重，预料发生了重大事情。当宣读中央电报时，才知道是毛主席

去世了。每天听到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从来没听说毛主席闹病，怎么一下子突然去世了？想不通，想不到，不愿接受这一无情的现实。毛主席一死，天塌下来了，中国何去何从？华国锋已被毛主席指定为接班人，他能接起班吗？带着悲痛、疑问、忧虑回到襄汾，赶快传达，讨论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强调重要单位、仓库、监狱、油站等一切重要的地方，都要严加看管，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

晚上新闻联播广播了《告全国同胞书》，一遍又一遍播放哀乐，全县上下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我的工作悲痛中十分紧张，首先考虑全县的安全，“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其次组织悼念毛主席的活动，设置灵堂，组织全县人民悼念毛主席。再次筹备全县追悼大会，在中央追悼大会之后，我要代表全县人民念一篇悼词，表达襄汾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和怀念。讲的要结合襄汾的实际，反映襄汾人民的心声，表达襄汾人民的深厚感情，我在悲痛中苦思冥想，有时也和宣传部的杨耀水讨论一下，当时决定悼词我要亲自动笔，一定把我对毛主席的感恩之情充分表达出来。那时，正是我刚刚戒烟不久，思想的悲痛，工作的压力，加上谋划悼词的思虑，精神上从未处于如此困难境地，用毅力战胜困难，战胜戒烟的折磨，经过三、四天努力，终于写出了充满感情的一篇悼词。

这篇悼词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在写这段回忆时，我又翻阅了几遍。当时宣读时，全场两万多人被感动的声泪俱下，群众说我念的悼词比华国锋的悼词更有感情。几十年过去了，许多襄汾人一见我就常常说起听悼词的悲痛心情，夸奖这是一篇最好的讲话。为啥襄汾人民被这篇悼词所打动，所激动呢，为啥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还记得这篇悼词呢？当然，首先是毛主席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另外，不容回避，这篇悼词也有自身的特色。历史的印迹很多，当时流行的现在被看作错误的理论、观点、词句很多。特殊的是，它写了红军东渡“是您派出红军东渡黄河，来到了我们襄汾；点燃了抗日的烽火，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组织起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建立了襄汾人民自己的武装。从此，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襄汾人民在汾河两岸、塔儿山区、开展了抗日的人民武装斗争，迎来了胜利的时光。”写了推翻“三座大山”，襄汾人民获得解放的欣喜和快乐，写了毛主席领导土改，农民分得土地，享受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美满生活……一件件大事，紧密联系襄汾的实际，联系襄汾群众的历史变化。讲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说：“您把

自己的儿子送到了朝鲜前线，在同侵略者浴血奋战中光荣牺牲。在中国革命的每个重大关头，总有您的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具体的事实震撼人心。“回顾黑暗的旧社会，看看我们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今天，想想旧社会我们襄汾人民的苦难，看看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懂得，没有您老人家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我们失去了敬爱的领袖，就像孩儿离开了娘。这几天，多少人嗓子哭哑了，眼睛哭肿了，眼泪哭干了，我们没有想过毛主席会离开我们，直到现在还觉得敬爱的毛主席就在我们眼前。九天过去了，这是我们一生中最悲痛的九天。”这些悼念的词句，都发自我的内心，有相同经历的众多群众，都被震动，产生了共鸣！回忆当时的场面，老天爷也被感动，雨一直下个不停，两万多人在雨中站立，鸦雀无声，听到动情处，只听一片抽啼声，雨和泪水交融在一起，湿透衣衫，湿透大地。这是毛主席的力量，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空前绝后的历史！

1981年6月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毛泽东。我也经过不断学习，从迷信中逐渐解放出来，一分为二看待毛泽东，认识到毛泽东自反右以来所犯严重错误，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重新分析我在襄汾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显然是迷信中的说辞。襄汾人民自今不忘，关键是当时的言语联系了襄汾的实际，打动了人心。我在许多会议的讲话，都是联系本地的实际，只有联系实际的话，老百姓才愿意听。老百姓最讨厌干部讲空话、大话、套话、假话。

二十、如何对待顶头上司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专制主义根深蒂固。解放后，本应大兴民主，1957年后，万马齐喑。全国一个人说了算。一个地方党的一把手说了算。党内出现了许多党棍，对上他是孙子，对下他是老爷，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些干部心术不正，对顶头上司投其所好，溜须拍马。1976年9月8日，地委召开第七次“批邓”动员大会。在此之前的8月8日，地委还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十周年会议。赵书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英明正确，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导中国革命，长远的历史的意义。赵书记讲话后，洪洞、

侯马、安泽几个书记，高调唱赞歌，什么“及时雨”很解渴。高屋建瓴、拨云见日等，听了十分肉麻。对于临汾地委的这种风气我十分反感。

开完动员大会后，又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何学大寨，全区粮食产量达“纲要”。在会上我给地委提意见，并把自己摆进去，说“我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检讨，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没有做县委应该做的工作，还是催种催收。是县委书记的身份，生产队长的水平”。我说地委提出全区粮食产量达纲要，总产超过20亿斤，喊了三年啦，没有达到，照这样下去，明年照样达不到。人家河北赵县达“纲要”，过“黄河”，有全区性的措施。我说地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方面没拿出全区的措施，也是催种催收，是否也有点地委书记的身份，生产队长的水平。问题提得尖锐，赵雨亭听不进去，不去理解意见的本意。在后来把我打成“四人帮”在襄汾的代理人以后，说我“攻击地委书记不如生产队长”，作为我篡党夺权的一大罪状。赵雨亭在回忆录《我选择的道路》中，又写上我“攻击”他“不如一个生产队长”。

在小岗村社员签生死状，引发农村改革之后，已经证明社员觉悟之高超过许多官员，还要把我有关人生产队长的比喻，作为攻击的罪状，可见官老爷的尊容丝毫不容触动，根本不承认“人生来平等”的观念。这又形成对赵书记的不恭。后来，翼城县委书记王兴亚告我，赵雨亭是老虎屁股，谁敢摸！以前有三个县委书记给他提过意见，都被他打成反党集团，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你还算幸运！细想也真是后怕，那时，年轻气盛，初生牛犊，心里不满，有话必说，不吐不快，硬把自己列到赵雨亭的“政治死敌”。做人应有人格，不能低三下四，为了讨好顶头上司，点头哈腰，恭维逢迎，昧着良心说瞎话。顶头上司不对，保持沉默，可以。民主作风好的，应该知无不言。但是一定讲究方法，讲究效果。碰上赵雨亭这样的顶头上司，惹不起，躲得起，说实话、受实祸的傻事，应该坚决不干。个人受整事小，一个县的工作受害，事关百姓利害事大。

二十一、旗帜鲜明亮态度

1976年十月下旬，七一渠延长工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事件。

开挖七一渠两万民工上工地，住在七一渠沿线村庄老百姓的空房里。贾庄公社燕村大队民工住在申村，那么多民工住在村里难免干扰村民的正常生活，给群

众带来不便，引起不满。理智一点，村干部做一点工作，就不会闹事。一天下午上工的时候，申村的社员挑事，说燕村的民工走小路踩了他们的庄稼，发生了争执，闹起来了。有一个人跑到申村大队广播站打开高音喇叭叫喊，“申村社员们，我们村的人被燕村的人打了，赶快集合，快，快去？”这样一发动，村里许多人带上棍棒、铁锹、镢头跑到闹事地方，不容分说，对燕村民工乱打一顿。然后又回到村里，把燕村民工做饭的锅、缸、盆，全部砸烂。燕村的七个民工受重伤送到医院。事件发生后，两万民工，人心浮动，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准备再干了。燕村的一百多民工卷上行李撤离了工地。工程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杨保富找我汇报，要求严惩事件的制造者和凶手。我说让公安局派人去调查，弄清情况后给地区公安处报告。

中央十六号文件，粉碎“四人帮”情况的通报，明确讲要严惩打砸抢行为。这是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现行事件，一定要严惩。过了几天，县公安局弄清情况，决定逮捕支部书记王海法，他是打砸抢的指挥者。还有两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使用的凶器是钢筋，重伤者主要是这两个人所致。公安局请示报告，我签字同意上报。不久，地区批准逮捕那三个肇事者。杨保富又向我汇报，说要开一个大会，在大会上逮捕那三个罪犯，并要求我去参加大会讲话，以此稳定挖渠的民工队伍。我表示同意。

开会的那天，我提前到达大会会场。会场设在一个取土的现场，坡上是主席台，取土后的大坑是大会场，主席台上摆了一排课桌椅。我就坐在左边的边上，杨保富宣布大会开始，把罪犯押到台上后，从主席台的东北方向，由几个强壮的青年押着三个批斗的对象，脖子上挂着牌子，只见走在最前边的王海法，步履缓慢，行走艰难，押到主席台上，我坐的地方在犯人的后边，一看王海法的牌子是木板框子里边装的钢板，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我马上对杨保富说：“胡来，勒住人家的脖子，死了，谁负责任，赶快把牌子放下来！”杨说：“大家恨王海法！”我说：“恨，也得按法办事！”杨保富没办法拒绝，只好叫押犯人的，给王海法把钢板牌子放下来。

会后，把犯人押走了，我站在原地又对杨保富说：不能瞎干，要依法办事。要是我们犯了法，别人给你挂上钢板牌子，你愿不愿意？

后来开常委会，我又批评杨保富，现在粉碎“四人帮”了，我们一定要依法

办事，千万不敢胡来！这件事是工地副指挥李子良，组织人马干的，是我当场制止，三次提出批评，本来和我没有关系。后来他们把这件事栽在我头上，汇报给地委、省委，作为我迫害基层干部的一大罪状。

省委书记王金籽知道后，追住不放，一直要钢板牌子。杨保富做贼心虚，不敢上交，说牌子已经不在。后来，王金籽说，省委办“四人帮”罪行展览，要作为“四人帮”黑爪牙的罪证，必须交来牌子。杨保富和革委主任张铭（汇报此事者）就决定再做一块钢板牌子交到省委去展览。山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所谓山西“四人帮”罪行展览开展，王谦书记领上地委书记参观，走到这牌钢板前，听完讲解员解说后，王谦提了提到那块钢板牌子，对王定谟说：“回去给李辅挂一挂，让他也试一试！”这些情况都是专案组长张大勇告我的。当我知道后，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王谦书记，揭露事件的真相。让我老婆探视时拿走，寄到太原，由我十多岁的大女儿送到王谦书记家里，后来知道，展览会中期，就把这块钢板牌子撤走了。

面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必须旗帜鲜明，亮明态度，坚决制止，严厉批评。像此次申村事件，如果稍有含糊，就会发生严重后果，惹祸上身。

二十二、形势动荡，心要稳当

十一月初，省委在太原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会议开始前夜，省委就把李瑞芳、李文亮、刘志英、杨国和四人逮捕。会议开始就充满恐怖气氛。陈永贵的高参张怀英被任命运城地委书记，在会上得意扬扬，春风八面。昔阳的李韩锁进了省委领导班子，昔阳的公社书记当上了省委秘书长，会议十分明显，跟着陈永贵的就是革命派，弹冠相庆。和陈永贵不是一派的就是反革命派，就入狱坐牢。特别是逮捕刘志英，他只是组织部一个处长，离“四人帮”老远老远。抓刘志英明显是王谦的报复行为，就是因为刘志英给其老婆提过意见，送过大字报，就把刘志英先抓起来。

在山西真正谁和“四人帮”关系最为密切，当然是陈永贵。江青两次到大寨，陈永贵、郭风莲把江青当祖奶奶供奉，为了安静，不让开山放炮，把仓库腾出来，给江青放上马筒。江青骑马兜风，陈、郭鞍前马后陪侍。特别是借用江青之手，把谢振华打下台去，篡夺山西党政领导大权。

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中，王谦紧跟“四人帮”，在太原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邓小平。给邓小平戴了“邓纳吉”“还乡团”“牛鬼蛇神总代表”共七顶帽子，那真是竭尽全力。会议期间又把谢振华作为“四人帮”势力，清查以大寨划线，谁反大寨谁就是反革命。把反对陈永贵搞派性、搞极左，都要打成反革命。会议结束后，我乘吉普车回襄汾，在晋中各县看到许多大标语，写着逮捕了什么人，“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除恶务尽”，白色恐怖笼罩山西大地。

临汾地委清查“四人帮”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地委副书记老干部胡亦仁，还有同情或支持胡亦仁的地委常委、宣传部长郭璞和地区革委副主任郭允瑞。胡亦仁是老资格，曾在中宣部工作，行政九级，比赵雨亭还高一级。此人看不惯赵雨亭搞极左、假表演、昧良心的一些做法。平时满不在乎，不以为然，对赵雨亭的一些做法不屑一顾。有时在大会上当赵雨亭讲话时，胡亦仁却在主席台上嗑瓜子，早就引起赵雨亭的仇恨与不满。借这次清查“四人帮”就把胡亦仁打成“四人帮”的黑手，必欲置之死地，排除出领导班子。为达到此目的，赵雨亭在三月十六日地直机关举行第三次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上的讲话中，编造了许多谎言。说什么“我区少数人是和‘四人帮’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他们为紧跟‘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部署，全面地从思想上，舆论上，组织上，行动上，物质上进行了准备，而且既有幕后策划者、指挥者，又有秘密联络网，既作了夺权庆祝活动的准备，也还有一定的武装准备。”

“也还有一定的武装准备”，说的是蒲县武装部和县委书记杨桂舟。蒲县武装部长是69军调过来的，爱打猎，杨桂舟也喜欢打猎。为此，向69军要过两万发子弹。这件事和“四人帮”篡党夺权根本无关。当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知道此事后，为了进一步打击谢振华，就把这件事和“四人帮”篡党夺权准备武装政变捆在一起。地区公安处长高堂侯，老资格，一直上不去，认为升官的机会到了，还专门派人到蒲县东岳庙的垣上，周边挖了一圈战壕，说是搞武装政变的工事。赵雨亭等人神秘兮兮，真以为逮住了“立功”的时机，抱住了“升官”的西瓜，利令智昏，组织大批人马，软硬兼施，真想把谎言变成事实。我参加过一次地委召开的会议，赵雨亭追问杨桂舟，谁去过蒲县，说了些什么，子弹是从哪里来的，准备干什么？步步紧逼，让杨桂舟交待。接任赵雨亭任地委书记的王定谟，更是变本加厉，新官上任三把火，亲自跑到蒲县对杨桂舟施加压力，结果杨桂舟被逼

自杀了。杨桂舟一死，这班人马更加紧张，在地区五七干校，连夜突审被关的蒲县干部和有关人员。当时我已被关在五七干校，有一天，突然气氛变得紧张。我住在二楼，楼下每天晚上高声吼叫，搞车轮战术，想要逼出些什么，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赵雨亭和王定谟们跟着王谦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最后，王定谟一人承揽逼死杨桂舟的责任，受到了撤职和留党察看的处分，高堂侯也黄粱一梦，空喜一场。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些整人的人，什么话都能编出来，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为了个人目的，他们可以挖空心思，费尽心机，不择手段！临汾杨桂舟被逼死，运城地委秘书长贾满仓被逼死，晋中祁县革委主任牛晋山被逼死……面对残酷的党内斗争，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死神随时敲门呼叫，经不起，受不住，就被吓死了！在高压的恐怖中，我记住自己没有干过任何坏事，自己相信自己，“不怕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再大的台风，也有刮过去的时候。阶级斗争时代，当芝麻官得有这种心胸和胆量，更大的干部，需要更大的造化。“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耍手艺和当干部一样的道理。

二十三、十四条年轻的生命

1976年11月中旬，我正在太原开会，突然从襄汾传来噩耗：南辛店水利工地发生塌方，夺去十四个人的生命。震惊与痛心使我坐卧不安，心急如焚，真想“飞”回襄汾参加抢救和善后工作。

这时省里的会，一些人斗红了眼，会议开得发烫，压得人喘气。根本不敢请假，生怕当了“逃兵”，引起政治嫌疑。熬到会议结束，首先我到了塌方工地，一看十来米深坑，直上直下，像断壁一样，施工时既没有阶梯式取土，又没有保护设施，顶部也没人监督观看地面变化，完全是一起责任事故。当时对于事故处理没有任何制度性规定，如报告制度，立案调查制度，审查处理制度。什么制度都没有，看出当时执政者对安全生产的轻视，对人、生命、人权的蔑视，没有法律规定尊重人、保护生命，维护人权。我脑子里有关现代文明如何以人性的高度对待人，也一片茫然。我只是从良心、感情出发，一家一家看望了受难家庭，表示了悲悼，表示了慰问。善后工作也是力所能及的给予一点经济补助。受难家属也只能接受现实，不吵不闹，未提出任何要求，泪往肚里咽，自认倒霉。

回想大同煤矿60年千人矿难，严格保密，事后也没听说追究省、市、矿哪个领导的责任。改革开放后，情况明显改变。上世纪九十年代，山西首先出台矿难赔偿制度，规定一位遇难矿工，给予20万的抚恤金。对于领导追责也很严肃。襄汾尾矿垮坝导致襄汾县委书记、县长坐牢，临汾市委书记、市长被撤，山西省长引咎辞职。不管怎样，这些变化表现出社会的进步！

如今，我想起那十四条年轻生命的殒落，我心里还十分难受，谴责自己，有愧于他们。

通过对这一重大事故的反思，认识到领导干部要不断学习，更新观念，追求现代文明。

二十四、参加第二次全国学大寨会议

1976年12月2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虽然也讲学大寨，但主要是在全国部署揭、批、清“四人帮”罪行的运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大会上有一些典型发言，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如温州不学大寨，重副轻农，资本主义自由泛滥，当地群众没有粮食吃，25斤粮票就可以在温州领一个姑娘。革命圣地延安，群众饥饿，出现了人口贩子。其它一些贫困地区用粮票去延安换媳妇。山西西八县特别是河曲、保德从延安换回不少媳妇。还有的去四川泸州买姑娘。无锡地委一个领导，看到农业学大寨极左“一刀切”，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发出“不批陈永贵，柴米油盐贵”的心声，被作为“四人帮”爪牙攻击学大寨的言论，受到批判。许多民不聊生的典型事例，说是揭发“四人帮”破坏学大寨的罪行，实际上是“四人帮”利用学大寨口号，推行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

改革开放以后，温州成了全国最富的地方，无锡的乡镇企业发展成了全国学习的一个模式。这就充分说明学大寨使全国许多地方遭了殃，受了害。那些卖儿卖女的血泪事迹，不是不学大寨的结果，而是学大寨“大批促大干”把农民作为奴隶，不与其自由劳动、自由创造形成的恶果。

在全国学大寨会议的主旨报告中，华国锋提出“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我当时坐在人民大会堂听到这句话，就知道全国会有许多人被清查遭受打击。华

国锋的报告把帮和派绑在了一起，显然是错误的。帮，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属敌我性质的矛盾；派，文革中分两派，都是群众，是人民内部矛盾。把帮和派捆绑在一起，必然混淆敌我，打击一大片。

华国锋的讲话为陈永贵、王谦们在山西整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王谦划大线、切西瓜，又提出具体标准和方法。我当时就抱着准备挨整的姿态，小组讨论会上我靠边坐，一言不发。这时的赵雨亭，一改批邓的积极面目，又变成反“四人帮”的好汉，得意忘形，认为投靠陈永贵站对了队，摆出一副整人的架势，在会上挑动我说“过去在会上活跃的人，给地委提意见的人，为啥现在消沉了，一言不发？”我知道他敲打我，我照样不说，真的没法说，我不愿跟风说假话。

会议后期一天晚上，开全团大会。这时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已被任命为省委书记，一个公社书记张福元也早已任命了省委秘书长。会上三王：王谦、王庭栋、王金籽，声色俱厉，杀气腾腾，点了李文亮、吴象、白兴华等许多人，还提出要逮捕省委常委、中央候补委员王体，也疯狂攻击李顺达（时任中央委员、省委常委）。王庭栋发言时，污蔑白兴华向中央写信反映山西问题，是投靠“四人帮”，舔江青的屁股。“江青还没上厕所，还没解裤带，蹲在厕所，你就迫不及待要舔屁股”。那语言的污秽、肮脏不堪入耳，对人格的污辱如同流氓。不是他攻击的人要舔谁的屁股，而是他，要急着舔陈永贵的屁股！唉，官场上真是丑态百出。肚里没病，不怕冷风吹，我坐在一旁观看政治舞台上一幕幕的丑剧，一个又一个跳梁小丑的拙劣表演吧！

二十多天的会议，终生难忘。官场并不清静，也不平静。时有风雨雷电，也有跳樑小丑粉墨登场，长袖善舞，装神弄鬼。别看他们在台上一本正经，人模狗样，肚里装着满肚坏水，一有机会，趁风扬土，把水搅浑，什么坏事都敢干。这些人可以得势一时，却不能得势一世。善良的人要学会识别两面派的本领，保持冷静，保持定力。要知道首先要做人，其次是做官。“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老百姓常说“坏人不到头”，别说是普通一般的，就是那最大的当了天字一号的华国锋，也演了一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活报剧。如今众说纷纭，也不知历史如何定论！

二十五、当官不能押宝

1977年2月22日，大年初三，省委就在昔阳召开学大寨会议，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抓纲治国，大干快上”，陈永贵下令昔阳过革命化的春节，全省也要像大寨、昔阳一样革命化。

会议一开始，火药味特浓。王庭栋在致开幕词时，离开讲稿，不让录音，看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大骂陈永贵不喜欢和反对的人，进行了充分的表演，把会议一下子搞得杀气腾腾，根本不是学大寨会议，研究农业生产，还是进一步烧火加温，要借清查“四人帮”，铲掉异己，除“恶”务尽。

昔阳县领导发言，把山西农学院大寨分院的书记，打成“特务”，说是专门为“四人帮”搞大寨的情报。其实，就是因为该书记和陈永贵不是一派。平定县李锁寿作了示范发言，把给中央写信反映陈永贵问题的一个广播站的工作人员，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关在监狱。

什么政策界限，事实依据，都不讲了。只要认为你和他们不是一派，和他们意见不同，那就划大线，切西瓜，把你弄到“四人帮”帮派体系。1975年因反对“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的张、赵集团，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的1977年11月，不仅没有平反释放，在王谦的指使下反而把张珉、赵凤歧、罗建中重判死刑，要杀掉、斩草除根。浮山县也有个赵树理被打成“四人帮”黑手，隔离审查，严刑逼供，最后致死。死后把赵的尸体扔到一个山上土窑，一包炸药连窑带尸体全部炸掉。

那时，那帮人已红了眼，发了疯，无所顾忌，认为山西有陈永贵坐镇、做主，陈永贵又有华国锋支持，想咋干就咋干，一定要趁此次良机，把反对派，不同意见的人一网打尽，绝不留后患。这次学大寨会议就是一次整人再动员会议。运动已成脱缰的野马，狂奔疯跑。最典型的是吴象一案。三月份省里开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我见到了曾在襄汾下乡的省外办主任阎平。他当时被派到省委调研室当清查工作组组长。我问他吴象有什么问题？他说，问题太严重了。啥严重问题？阎平说，“1976年五月他到华山是为‘四人帮’搞武装政变召开军事会议。”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心里这样想。我告诉他吴象在工作队下乡工作将要结束时，因没去过华山，就领着吴锐、杨型淮去华山旅游。回来后，杨型淮告我，华山太险，吴象胆小，加上太累，爬山腿颤抖，不敢站起来走，最后硬是“四条腿”爬

上山去，第二天才下的山。这样的情况，怎么会是为“四人帮”武装政变召开军事会议呢？就这样荒唐离奇的事，阎平都不表态，没有丝毫怀疑的意思。

后来，听人介绍当时山西日报总编说，“华主席才五十多岁，咱们跟上，一辈子也就交代了！”好多人就是怀着这种押宝赌博的心里，不管不顾，跟着整人了。王谦把宝押在陈永贵身上，陈永贵把宝押在华国锋身上，结果都没押在红心上。政坛风云变幻，决不能押宝，要押就押在人民身上，“得民心者得天下”，普通干部当然谈不上“天下”，但求不被打得爬在“地下”！

【述往】

甘肃乡村见闻

——白色的国旗与希望工程

向真

一、国旗是白色的

1994年我到甘肃采访“纯朴的山里娃”，回来发在《中国儿童报》头版头条受到师生欢迎，也不在我写得多么煽情，因为大城市的独生子女和他们的家长想了解国家级贫困地区孩子的生活现状。采访时我特意坐了好几个小时汽车，才到达几所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小学，娃娃们求学的艰难超乎我之前的想象。有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在其中两所小学校，我都参加过升旗仪式，升国旗在农村小学同样是顶隆重的仪式。当时我惊讶地盯着那面小小的、破旧的国旗在风中时飘时垂，鲜艳的红色呢？五颗夺目的黄色星星呢？在经年的日晒风吹雨淋下消失净尽了，哪里还有国旗的样子？分明是一块残破的、早已褪色的旧布！

在第一所学校见到这情景，追问后得知学校没有换国旗的费用，我离开前掏出钱交给校长，对他说“这点钱您去买一面新国旗吧！”第二天，我在很远的另一所学校居然见到完全相同的景象，只是昨天的旗还有一点褐黄色，这面旗几近灰白色，升旗时我的心再次被狠狠刺痛。课间我采访孩子们时有些魂不守舍，我突然问“国旗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白颜色的吧。”孩子们抢着告诉我，听了这话，我的眼泪当时就控制不住了……

我比原计划少跑了一所学校，上长途汽车前专门跑到陇西县政府非要见县长不可，好不容易见到刚从宴会餐桌前回来的主管教育的副县长，看到他满脸红光、喜形于色的样子，我的火气腾地一下升上来，劈头盖脸冲他喊道“你不要对我说拿不出钱的任何理由，县政府有责任尽快、无条件地把拖欠老师半年多的工资发给他们！如果一个半月后办不到，我马上写内参，直接向中央领导告发你！”那顿脾气没浪费，回京后一个月左右，我收到两位老师的报喜来信，告诉我“拖欠的工资补发了”！

比拖欠老师工资更令我耿耿于怀的是“白色国旗”，我百思不解，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染红的国旗，怎么就经不起风吹雨淋蜕变成白色的了？教育经费中真的就抽不出一元钱用于定期更换国旗吗？从1988年起，每年岁末我都给开春后的两会准备提案，开始两年总围着制定、修改“出版法”做文章，之后写提高教育经费的提案，尽管言辞中肯、对比详尽，却总是没了下文。我因被民进领导内定“不得出席两会”，加上没有高级职称或处以上职务，没资格当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只能写提案由别人代劳提交两会，写得好不好在自己努力，受不受重视则唯余被动。从甘肃返京后我写的两会提案中有一个就是“为贫困地区拨专款买国旗，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这项提案起没起作用我不得而知。但随后我曾把这篇短小的稿件寄给两家报社，心想有一家刊登就满意了，所以一稿两投。没料到时隔不久《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几乎同时都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出来，标题也相同“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

好几年过去，我们报社的记者已很少有机会出差了，所以说不清如今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是否还认为“国旗是白色的”。假设大城市学校里的孩子们，仰望的国旗是我曾经看到的那种破旧褪色的布片，我们成年人心中该做何感想呢？

二、首次结缘希望工程

接着说那次在陇西县农村的经历。来陇西前，在甘肃省会兰州时，省团委女书记请我吃饭聊天，我不想去饭馆，提出想尝尝兰州烧烤，女书记笑道“烧烤是下里巴人的美食，只能在街边吃，馆子里没有。”我说“咱就街边聊天呗。”省级劳模出身的女书记主随客便，那天晚饭我俩和省少工委主任小沙，坐在街边凳子上边吃烧烤边聊天，我第一次品尝烧烤，之前在北京都没见过，连夸味道足、吃

着过瘾。我们三位女士聊得也很愉快，我告知要去陇西、定西采访小学校，团省委书记坚持让小沙陪我一起去，“不然你自己怎么走那么多山路”，我不再推辞，小沙联系到车后陪我跑了三天。

在一所破败的小学四年级教室里，我问冬天有没有煤炉子？老师说没有，“孩子们坐在条凳上搓手跺脚，老师站在前面跺脚搓手。”教室里没有讲台，没有足够亮的灯，北方冬季严寒，乡村学校居然连取暖设施都没有！我在那里是十月中旬，天还没冷，我发现一个男孩穿了件袖子磨得只剩多半截的破棉袄，小脸脏乎乎的，问了他两个小问题，他答得挺好的。离开教室，老师说他“交不上学费，马上要退学了”，我提出去他家看看。

男孩家在学校不远的半山坡上，低头进门看到女主人，我说“大妈您好！”跟她握着手聊几句家常话，得知她比我小十多岁时，我心中打翻了五味瓶，城乡差别巨大到骇人的地步，让我想哭更觉心苦。口渴没好意思要水，离开他家小沙说这里几年没下雨了，严重缺水，农民不洗澡不洗脸，各家都不招待客人喝水。我提出给男孩一些钱别让他退学，陪同来的大队辅导员说走希望工程吧，交几百元钱那孩子能念完小学，我按着做了。不久后大队辅导员来信告诉我，为此已经有两个学生退了学，还有几个家长又提出退学，理由是“他有人出钱，我家没人管？”

提起笔不知道该怎么给学校回信，只得放下了，当时我婆婆患尿毒症每周两次透析，举家返贫，省吃俭用还得借钱，甘肃出差我不住宾馆省下出差补贴帮个孩子，再多力不从心。那件事让我看到贫困地区的病根所在，对希望工程有了质疑。无巧不成书，有天我先生告诉我“希望工程捐资给国家文物局一套高级音响设备。”我问“希望工程的钱不是用来捐资助学的吗？干吗给你们？别的单位有吗？”了解后知道有项目需要合作，别的国家机关也得到希望工程的赞助，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片头片尾也有希望工程出资的字幕。

我不再认可这种“半官方慈善”，那之后除了几次报社从职工奖金或工资直接扣钱捐助希望工程以外，我再也不主动给希望工程捐款了。对了，你知道吗？甘肃陇西、定西地区长大的男孩子几乎个个都是硬笔书法家，都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们从小没条件参加体育和娱乐活动，把写字练字当成必修课。■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